



上海市手工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几个手工业合作社的典型调查

上海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錄

前 言.....	1
十年来上海手工业的巨大变化.....	3
“三把榔头起家”到轉为上海自行車三厂.....	15
新安棉織生产合作社的变迁.....	45
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过渡为国营工厂的.....	66
徐行草織品供銷生产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	78
星鋒竹器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	93

前 言

解放十年来，在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上海手工业者无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政治思想面貌方面以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千年以来那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手工业的落后生产方式，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已经改观，旧社会那种小手工业者生产不稳定、技术落后保守、生活贫穷困苦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上海手工业十年来的深刻变化和伟大成就，极其明显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证明了党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的正确性。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不断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对手工业者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组织起来，从小到大、由低到高、循序前进的结果。这是党运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来具体指导实践的巨大成功，这也是党的大搞群众运动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本书收集了六篇文章，其中“十年来上海手工业的巨大变化”一篇，是上海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另外几篇是几个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和变化的典型材料。我们希望通过这几篇短文，能够在上海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方面，提

供一些面和点的材料，作为有关部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

五篇典型材料写的都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发生发展的情况。这几个合作社是铁床车具生产合作社、新安棉织生产合作社、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徐行草织品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星锋竹器生产合作社。其中铁床社是解放初期以手工业失业工人为主第一批组织起来的，1958年该社已与其他社、厂合并改组为地方国营上海自行车三厂；新安、南阳两社则是以个体手工业为主组织起来的，1958年也已发展成为地方国营新安棉织厂和地方国营星火机械厂；徐行草织社则是以郊区农副业为主的供销生产合作社，本市郊区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改组成为嘉定县徐行人民公社草织工艺厂；星锋竹器生产合作社是目前仍旧保持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社之一。为了反映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有几个单位的经济类型已经有了变化，名称也已改变，但是本书中仍然使用他们原来的名称。这五个手工业社在通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虽然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出上海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面貌和一般的发展规律。

在编写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有关基层手工业社和有关联社给了我们不少帮助，铁床车具生产合作社一篇，原稿系由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作组撰写，现经我们稍加补充后一并发表。

上海手工业行业众多，情况比较复杂，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还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上海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1959年11月

十年来上海手工业的巨大变化

朱紀青

上海是我国现代工业集中的大城市之一，手工业也很发达。据解放初期的調查，全市共有手工业58,400多戶，128,000余人，180多个行业，其中主要的有手工棉針織、服装縫紉、竹木家具、五金鉄器、皮革制品等90多个。在这些行业中，既有制造性的，又有修理服务性的；既有日用消費品，也有生产資料，还有丰富多采的工艺美术品。全市手工业产品估計不下数万余种。經營的方式也很灵活，有的在固定工場进行生产，有的遊街串巷分散服务，有的自己备料自产自銷，有的承接来料翻新补旧。这些生产上和經營上的特点，长期以来，使上海的手工业能够不断地适应分散的、复杂的和千变万化的社会需要，因而它同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民經济中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但是，上海手工业与全国各地一样，长期以来建立在个体私有制的基础上，在生产上分散、落后、盲目、保守，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能克服生产上和銷售上的困难，不能摆脱商业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控制与剝削，更不能适应解放以后国家有計劃地进行經济建設的要求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手工业是个体經济，时刻滋长着

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如果任其自流，不可避免地将会走向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贫穷破产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对个体手工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早在 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明确指出，必须逐步而积极地引导个体手工业向现代化的、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并使广大手工业者走向幸福、富裕的社会主义大道。解放十年来，上海的手工业正是沿着党所指示的正确方向，不断向前发展，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从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给经济上普遍陷于奄奄一息的手工业带来了生机。解放初期，本市国民经济摆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久，虽然存在许多困难，但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国民经济各部门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本市手工业通过国家贷款、加工订货和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措施，生产逐步好转。1952 年全市手工业的总产值比 1949 年增加 70.3%。在生产恢复的同时，本市手工业主管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又着手组织手工业合作社的试点工作。1950 年上半年，手工业失业工人在党和政府的“生产自救”的号召下，开始组织铁床车具、衬衫等第一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0—1952 年三年内，为了树立旗帜、吸取经验，根据自愿的原则，又先后继续组织了一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 1952 年底止，全市已有手工业合作社 35 个，社员近 4,000 人。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的建设时期。就在这一年，党中央公布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指出，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合作总社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确定了对手工业改造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提出了根据手工业劳动者的觉悟程度，采取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供销生产社和生产合作社三种组织形式，明确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以及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发展步骤，从而推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阶段。1954年一年中，上海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社员数就比1950—1953年四年内组织起来的总人数增加近三倍。手工业合作社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巩固提高的过程。手工业合作社组织起来以后，坚决依靠广大社员群众，不断开展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运动，不断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挖掘手工业生产的潜在力量，逐步建立和健全生产组织与管理制度，使手工业合作社从思想上、组织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此同时，市手工业生产联社的供销部门为了便于按行按业对手工业进行生产全面安排，积极发展了与个体手工业在供销业务上的联系，对他们有计划地分配原料、收购成品，使那些原来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户，按行业按地段初步联系起来，这样就为1955年下半年开始按行业成批地组织手工业社准备了条件，使全市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55年底止，全市共有444个手工业合作社，社员28,614人，年产值达到6,274万元。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公布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了一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接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迅速到来。1956年初，在本市郊区农民实现农业合作化、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同时，上海手工业也迅速形成合作化运动高潮，各区各行各业的手工业劳动者日以万計地递送入社申請书，在短短四天之内，实现了本市手工业全面合作化。在合作化高潮中，被批准参加合作社的个体手工业者計有32,693戶、71,103人(其他的随同合营一併改造)，連同划归手工业改造的工場手工业，共有34,641戶、86,341人。这时，除了一些产品独特、人数很少的手工业戶仍暂时保持个体經營以外，絕大多数都分別建立新社或併入老社。至此，本市手工业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資料个体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改造任务。接着，圍繞生产进行整社工作。1957年年底，本市共有手工业合作社1,632个，社員119,133人，其中高級形式的生产合作社1,054个，社員101,152人，占总人数的84.9%。全市手工业合作組織的年产值达到39,728万元。

手工业合作化后，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手工业生产关系的改变，推动了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1957年手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計划規定产值指标的33.51%，比1952年的产值提高了近一倍。同期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4%，比1949年則提高一点二倍，并且生产出了更多更好的产品来为工农业生产、城乡人民生活 and 供应出口需要服务。仅就1956—1957年两年的統計，支援工业和基本建設

需要的小五金产品有43万公斤，煤鍬33万把，板箱515万只，縫紉机台板18万件；支援农业生产的大小鉄木农具67万件，噴霧、噴粉器12万架，修配各种鉄木机械的零件20余万件；供应城乡人民生活需要的有棉布3,299万公尺，毛巾45万打，襪子399万打，服装2,907万件，皮鞋93万双；供应出口的，仅1957年就有工艺美术品、服装、皮鞋等30余种，1957年出口的数量和1956年比較，地毯增加58%，皮鞋增加77%，服装增加112%，各种艺术雕刻品增加115%。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社员的經濟生活更加稳定，95%以上的社员的工資收入比入社前的劳动收入有所增加，1958年社员的平均工資比1956年的平均工資增加了15.2%，已接近或相等于同行业国营工厂职工的工資水平。从1956年下半年起施行了福利条例，全面实行了一般疾病的免費医疗和生活困难补助等，从此手工业社员不必再为生、老、病、死、伤、殘担忧。同时手工业合作社还为社员举办扫盲班、业余文化学校，使大部份社员改变了文盲和半文盲状况。在党的领导下，手工业合作社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教育的学校，社员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改变了原来个体手工业者落后、保守和自私的精神面貌，不断地涌现出許多先进生产者，不少社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有不少社员被选为市或区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妇女代表等。从此，手工业劳动者結束了受压迫、受剝削的悲惨历史，走上了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

整風整社，政治思想上的丰收

个体手工业全面合作化的实现，摧毁了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手工业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手工业合作社中，政治领导薄弱，生产混乱，个别的还被坏份子操纵和窃据领导权；很多社员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在思想上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手工业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时有抬头。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开放时，有一些小业主和富裕独立劳动者对这种自由市场的性质认识不足，就想走回头路，乘机掀起了一股退社、跑自由市场的歪风，他们退出合作社搞“地下工厂”，并且诱骗一部份社员为他们生产，因而在那段时期内，有些社员“骑两头马”，白天在合作社生产，晚上为“地下工厂”生产。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时，手工业合作社里也有人公开叫嚣“合作社不如单干”、“手工业合作化搞糟了”等等。同时，也还有些社员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对产品质量没有自己经营时那样关心。某些社干部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和一部份社员的极端民主化倾向也阻碍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贯彻。而社员与社员之间，往往因为工资高低或狭隘的行会观念而造成不团结。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合作社的巩固。为了明辨大是大非，端正政治方向，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以进一步巩固合作社，1958年初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统一部署和各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手工业合作社

全面开展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手工业合作社的整风运动,使广大社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划清了大是大非的界线,因而一方面揭发和清除了少数坏分子,整顿了合作社的队伍,纯洁了合作社的组织,树立和巩固了手工业工人与贫苦独立劳动者的领导优势,保证了党的绝对领导;另一方面,通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受到严肃批判,社会主义思想空前高涨,合作社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干部与社员或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了改善。手工业合作社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广大社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提高后,发挥了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尤其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他们更是精神奋发,干劲冲天,从而出现了生产大跃进的局面。1958年手工业的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31.65%,资金积累增长了22%。很多产品产量成倍地增加,新产品、新花色层出不穷。比如五金行业所属单位,一年中便产生了金属切削机床506台,各式电动机4,791台;工艺美术行业所属单位所增加的新花色新品种就有5,000余种。

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1958年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过程中,全市大部份手工业合作社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大大跃进了一步。手工业合作社向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过渡,是手工业社会

主义改造和手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手工业生产在国家的帮助和有关部門的协作下，迅速发展，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大大增加，这就相应地扩大了合作社中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因素；手工业合作社中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增加，生产活动必然要求进一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特别是广大社員通过偉大的整风运动，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积极要求跳出集体所有制的狭小范围，直接为国家創造财富。这些都为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准备了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加以本市手工业合作社在 1957 年試点轉厂过渡中已經积累了初步經驗，因此，在 1958 年就出現了手工业合作社分期分批地向全民所有制工厂过渡的現象。据 1959 年第一季度的統計，全市 16 万多社員中（包括郊区各县），已經过渡为地方国营工厂的有 94,800 人，佔 58.62%。手工业合作社轉变为地方国营工厂以后，就可以使合作社原有的資金、設備、技术力量和劳动力等，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也便于国家按行业、按产品統一安排生产和全面规划，使很多单位按照国家计划，通过经济改組和改建扩建，进一步获得迅速发展。另外，約佔 23% 左右的社員在郊区公社化运动中，轉变为人民公社所属工厂。手工业社轉为人民公社领导下的社办工业后，为了保持原有生产和管理上的优点，一般仍旧单独核算，成为公社大集体领导下的小集体。它們在公社工农商学兵相結合、农林牧副漁綜合发展的方針下，更有利于工农业生产和农副业生产的密切結合，进一步推动生产的发展。

但是，目前，手工业合作社的生产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人民群众对于手工业的生产品种、服务方式要求多种多样，这就

在客觀上决定了手工业所有制的形式必需是多种多样的；也就是說，既要有全民所有制，也要有一定的集体所有制。因此，在全市大部份手工业合作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轉为人民公社工业的同时，还有一部份手工业合作社、組仍然繼續保持了原来的集体所有制經濟性質。它們主要是服装縫紉、日用小商品和一些服务性的行业。这些手工业合作社中，生产資料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和社員思想覺悟一般是适应的，对于生产的发展也还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今后一定时期內，仍将以原有的生产經營上的特点，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生产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大鬧技术革命

本市手工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与手工业的落后生产技术基础之間产生了尖銳的矛盾。由于手工业过去长期停滞在分散、落后的經濟基础上，生产設備簡陋，手工操作仍然是主要的形式。全市手工业1957年的总产值中，現代工业产值只佔11.7%，劳动生产率仅及大工业的四分之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基础已經远远地不能适应生产大跃进形势的迫切要求。为了发展生产力，适应客觀需要，必须尽快地使一切可以使用机器的手工业都用机器装备起来，使手工业生产轉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本市手工业者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破除了迷信，打破了自卑感，充分發揮了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

和技术革命运动。根据在手工业中实行“充分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自己武装自己”的方针，并在国家、上级社及有关部門的帮助和协作下，因陋就简地从改革现在工具设备和提高技艺入手，采取土洋結合、由土到洋的办法，自己动手制造各种机器设备，不少单位逐步实现了半机械和机械化的生产。到1958年底，全市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工厂以及过渡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中，共有各种机器设备31,545台，其中使用动力的有7,326台，全市手工业社、厂共有电动机2,305台，約4,100匹馬力。同年上述单位中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生产人数約占全部人数的39%，产值約佔60%。其中如五金行业60个手工业社，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比重已达到90%以上，据不完全的統計，土法制造的机器设备計有281台，从土到洋、自己武装自己的电机设备共有453台。原来一向认为不能够机械化的工艺美术行业的手工业社，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比重，也从原来的16%提高到50%左右。

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

手工业生产的大跃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改变，成績是巨大的。但在本市手工业进行經濟改組、轉厂过渡和按行业归口管理过程中，由于缺乏經驗，对手工业品生产安排不够細緻，同时，更由于生产跟不上社会购买力的迅速增长，某些手工业小商品在市場供应上曾經一度出現过供应緊張的情况，和一些手工业品花色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的現象。这些缺点，很快得到党的重視并大力改正。自从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副食

品和手工业生产會議以来,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这些现象很快得到了改变。当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于那些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的手工业,争取积极改进业务,提高技术,不再恢复原来的手工操作;对某些行业,如现代化工业品已经能够代替手工业品,又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手工业品也不再恢复;同时手工业生产部门也积极采取“穷办法”来增加原材料的供应,发扬了利用废旧料和零料的传统习惯,扩大了原料来源;同时,并积极争取恢复与外地的产销协作关系。因而,本市手工业生产不仅迅速恢复,而且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59年9月底止,在产品品种上,已基本上恢复到1958年8月的水平,包括新增加的品种则已大大超过。在数量方面也有很大增加,如家具、炊具、日用杂品、妇女儿童服饰品等都已能充分或基本满足市场需要。在质量方面,大部分手工业品都有提高,服装精工细作,木器家具精雕细刻,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现在,本市广大手工业职工热烈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反右倾、鼓干劲、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已进一步开展了以“高产、优质、低成本、多品种”为中心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迅速掀起了新的生产高潮,大力生产秋后市场旺季需要的产品和冬令防寒取暖用品,并为1960年手工业生产继续跃进作好准备。

上海手工业在伟大的十年中,已经完成了从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变革,接着又有大部分手工业合作社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手工业生产关系上的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小生产者政治思想面貌的深刻变化。十年来的成绩是巨

大的。而取得这些巨大成绩的原因，是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国家的大力扶持，以及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和说服、示范的方法。

本市手工业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今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许多手工技艺还是祖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为了充分发挥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手工业人员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从事手工业生产、为人民需要服务是光荣的，提倡师傅带徒弟，培养手工业的接班人。同时还必须加强管理，很好地安排手工业生产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因此，本市手工业职工必须高高举起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而奋勇前进！

“三把榔头起家”到轉为

上海自行車三厂

上海市鉄床車具生产合作社，在1958年4月，已經和中華五金生产合作社以及18家公私合营工厂合併轉为地方国营上海自行車三厂。这是1958年国民經济全面大跃进中，上海市新出現的一所大型的、现代化的自行車工厂。这所工厂現有职工2,500余人。产品主要为“凤凰牌”高級輕便自行車。1958年，該厂共生产了自行車15万輛，其中出口到东南亚各地的就有6万多輛。以該厂最高生产能力計算，每年可产40万輛。

建厂过程中，鉄床社向国家提供了流动資金、机器設備和8,000平方公尺的新建厂房；共值120万元，以及大批技术力量和熟練的劳动力。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合作社、合营工厂合併扩建，比另起炉灶新建，要投資少、建設快、收效大。这里就来談談这个合作社是怎样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再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

(一) 鉄床社的建立与发展

“三把鋤头起家”

上海解放初期，曾經遭受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賣国集团的“禁运”封鎖和 1950 年“二六”轰炸的严重破坏，經濟上发生了一些暫时的困难。一部分資本家对企业經營信心不足，出現了工厂、商店停閉，工人失业的現象。鉄床业的工人也沒例外，他們同样遭到資本家的遣散解雇，先后失业的有 400 余人，占当时該业人員的 60% 左右。失业后的鉄床工人，在党和政府“生产自救”的号召下，他們为了生計，就自动結合，三五成群的上街流动修理鉄床和自行車。他們虽然終日串街游巷，上門修旧，但收入菲薄，有的人还不得不依靠政府和工会的救济度日，渴望着摆脱失业的痛苦，要求自力更生。

有一天，鉄床工人陈启明等三人在楊树浦一带流动修旧，接到了国棉十七厂委託他們修理 200 只鉄床的任务。但是三个人，完成这批任务显然在時間上、力量上有困难。他們很快地就想到，如果把鉄床业的失业弟兄組織起来，結成一个团体，集体生产，即使任务再多也沒有問題，而且又可以长期向外接洽业务，摆脱失业和貧困的痛苦。他們深深感到組織起来的必要，三个人很快就成了合作社的发起人。在党和政府及上海市手工业工会、市合作总社的具体帮助和支持下，1950 年 5 月 24 日鉄床車具生产合作社成立了，它是上海市最早建立的手工业合作社之一。

1

鉄床社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开始时虽有36个社員，但是他們长期遭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失业的痛苦，已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大家繳不起股金，勉强湊集了七十二元五角。社員徐松山为了入股，把仅有的两条褲子当了一条。当时，合作社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只有三把鉄錘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們承接了国棉十七厂的任务。开工生产时，沒有厂房，就在露天生产；沒有較大的工具，就在夜晚向熟悉的厂家借用，第二天一早送还；社里資金困难，沒有錢开伙，社員自己从家里带飯来吃。个别社員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思想动搖了，說：“合作社早晚要垮台，不如到私商那里做临时工去。”但絕大部分社員在党和有关部門的鼓舞、支援下，坚信合作化的道路是一条能够摆脱失业和貧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他們相信：“只要有党的領導，政府的支持，大家一条心，合作社就一定能够得到发展。”就是这个信念，使他們毫不动摇，坚持办社。新組織起来的合作社，很快地显示了茁壯的生命力。1951年6月，在全国合作总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會議上，鉄床社获得了荣誉奖励，成为上海和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的一面旗帜。

粉碎資本家的阴謀破坏

鉄床社組織起来后，一开始就遇到了同业資本家的破坏和进攻。組社初期，鉄床社向私营鴻裕床厂租得了一所破旧厂房，在上海市合作总社的支持下，承修了上海工人文化宫的300張旧鉄床。原来文化宫准备将这批破旧的鉄床每只作价

10元卖给私商，再以每只22元的价格向私商买进新床，一进一出相差3,600元。现在改由合作社加工改制，连增添部分零件在内，每只不过化四元三角，这就为工人文化宫节省了一大笔钱。这样，铁床社就初步建立起对外营业的信誉，业务开始好起来。

可是，私商对合作社的嫉恨，从此也愈来愈深。合作社的存在和发展，阻碍了他们进行种种投机倒把、获取暴利的活动，因而他们把合作社看作“眼中钉”，不惜使用种种手段打击铁床社。开头毒辣的一着，就是由鸿裕厂的资本家出面收回厂房，企图逼垮该社。铁床社理事会即召开社员大会，将资本家的这种用心，明白地告诉社员。社员们一讨论，决定到期归还厂房，搬到空地上露天生产，落雨时就找些棕棚和油桶的铁皮遮一下，坚持苦干。上海市合作总社知道这一情况后，即贷给他们2,600元，帮助他们在中山南路买下了一处厂房。从此，铁床社有了自己的生产场地。资本家一计未成，二计又来。接着，又由鸿裕床厂资方提出收回借用的工具。但是社员们没有被吓倒，他们自己制造了一些土机器来代替，有力地反击了资本家的阴谋破坏。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铁床社赢得了胜利。

铁床业的资本家虽然遭到了合作社的有力回击，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罢休，反而变本加厉。他们利用资金比较雄厚的有利条件，到处抢购原料，压价竞争，四出兜揽生意，并从中造谣诽谤，破坏合作社的信誉。1950年7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派人来上海接洽订购铁床1,500只，这是解放后上海铁床业接到的一笔很大的订货。私商闻讯后，为了不让合作社承

做，他們造謠說：“合作社的彈簧拉力不強，質量差。”山東省的採購同志親自到合作社和私營床廠實地試驗的結果，證明合作社的彈簧拉力有70斤；私商的彈簧拉力只有50斤。事實揭穿了謊言。於是山東省的採購同志全部向合作社訂了貨。資本家惱羞成怒，處處與鐵床社為難，他們不僅在承接業務方面造謠中傷，並且壟斷原材料，企圖截斷鐵床社的“後路”。他們曾在鐵床社承接業務後，搶先向市場收購鐵床的主要原料三角鐵子一空，並到處散布流言蜚語：“鐵床社沒有老板，沒有資金，更沒有機器，不可靠的。將來壞了帳，找不到人要錢。”這些陰謀詭計，都被鐵床社以嚴守信用、現款交易的事實徹底粉碎了。

資本家利用比較雄厚的資金壓不倒鐵床社的時候，並不肯從此罷手，他們進一步使用“拉出去”的辦法，採取高額工資利誘有技術的社員，企圖拖垮鐵床社。個別落後的社員曾因此一度動搖，鐵床社理事會及時發覺，召開社員大會公開揭露後，資本家的陰謀不但沒有得逞，相反成為反面教材教育了社員，提高了社員的覺悟。正如社員們說：“資本家有錢、有機器，就是沒有人，沒有人，機器和錢就是死東西；我們無錢、無機器，却有的是人。”而人是最寶貴的“資本”，有了人什麼事都好辦，什麼困難也能克服。鐵床社就是這樣依靠黨的領導，依靠國家和上級社的支援，依靠社員的團結一致，一一粉碎了資本家的這些陰謀破壞活動。

通過這場鬥爭，特別是經過後來的“五反”運動，全面擊退了資本家的猖狂進攻，不但鞏固了合作社在市場上的地位，為合作社的發展掃清了前進道路上的障礙，而且協助國家限制

了私营床业厂商的投机活动，稳定了铁床的市場价格。铁床社出厂的价格和规格，成为上海市貿易信託公司在当时向私营床商訂貨的依据。1952年秋季，铁床社与私商的銷售价格，是这样的：

产品名称	单位	规格	铁床社价格(元)	私营床商价格(元)	铁床社比私营床商价格低%
小人床	只	2尺半闊，4尺半长，1寸2分粗管子	26.50	27.00	1.85
鋼絲床	只	3尺闊，1寸半粗管子	34.47	36.00	4.25
铁皮垫元头床	只	3尺闊，1寸半粗管子	34.24	37.00	7.46
花板元头床	只	5尺闊花板，2寸粗管子	14.80	17.00	12.94

坚持走合作化的道路

铁床社在与同业资本家“較量”的同时，进行了内部的整頓。建社初期，有不少社員对合作社的性质、任务和前途，認識模糊。有的社員把合作社看成是“合伙鋪”，如社員安福金入社后十多天，社里要他按章繳股金，他說：“我是做不起老板的，让我做做伙計算了。”有些社員对合作社的前途缺乏信心，认为合作社沒有私营厂工資高、福利好，想离社到私营厂去。铁床社的理事会针对这些思想情况，組織社員学习“合作社法(草案)”和“社会发展史”，着重进行民主办社教育，讲解劳动創造世界、創造人类社会的真理；并利用飯后空隙时间，上大課或組織討論，帮助文化程度低的社員分析具体問題。由于不

断学习，社員明确認識到合作社的性質和任务，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从而就更加热爱合作社，在生产上发挥了积极性和創造性。如社員高才根建議把断头角鉄的廢料重軋路皮，做元头管子，变廢料为主料，一年就可为合作社节省約 3,400 元。又如噴漆部門的社員用銀油、石膏代替猪血和老粉填补縫道，减少噴漆后容易生銹的毛病，提高了产品质量，延长了鉄床的使用期限。

为了貫徹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針，鉄床社对社内棕床小組的帮会組織，开展了坚决的斗争。組社初期，为了帮助解决棕床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由 11 人組成棕床小組，在鉄床社的领导下，单独經营业务和核算。但在这个小組中，分有江西、苏州、上海三帮，彼此不团结，經常磨洋工，不遵守劳动紀律。“江西帮”头子楊大眼，甚至强迫社里每月要給他两次“当葷”，讓他們大吃大喝。当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拒絕时，他竟蛮不讲理，动手打人，严重破坏了合作社的生产秩序和劳动紀律。鉄床社在党委领导下，发动群众与这个帮会头子进行了說理斗争，最后把他清洗出社。与此同时，鉄床社还清除了前理事副主任潘松泉，因为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屡次营私舞弊，1950 年到 1951 年中間，先后盜卖鉄床社的财产中飽私囊达 2,000 元，約为当年盈利的 50% 左右。这个贪污分子在全体社員的一致要求下，被解送法院，受到了应有的懲罰。通过对帮会头子的斗争和贪污違法分子的处理，教育了社員群众，大大地加强了鉄床社内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在斗争中壮大

铁床社是在党的领导下，与社外资本家和社内帮会组织、浪费现象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到1952年底，已经具规模，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该社社员已从36人增加1159人，年产值达到112万余元，每人平均年产值为9,347元，比1950年增加了87.97%，自有资金已增加到155,000元。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原来由上海市合作总社帮助买下的中山南路10多间木板厂房已不够使用，于是再买下丽园路120余间厂房和12亩6分土地。生产上已使用一些简单的机械，开始摆脱手工操作。产品除铁床外，增加了医疗器械、自行车零件等五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公有资金积累的增加，社员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0年的36元上升到了1952年的70元左右。由于生活有了保证，这几年中，22个过去结不起婚的社员，先后找到了对象，安家立业，还有21个人买了上下班用的自行车。

铁床社能够从三把榔头和七十二元五角钱起家，在短短的三年中，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其原因有三。首先是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国家和上级社的大力扶助，以及社员的艰苦奋斗。这是铁床社能够经得起数次风波，克服重重困难而发展成长起来的根本原因。其次，该社组成人员比较纯洁，他们都是铁床业的失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长期以来身受资本家的剥削，饱尝失业的苦痛，有着摆脱穷困与剥削的强烈要求。一旦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合作社，他们就把自己的命运紧紧的

同合作社联結在一起，与資本家頑強地斗争，从不后退。在最艰苦的时刻，他們宁愿不拿工資，自己带飯上工，也不愿意离开合作社，大家团結一致，克服困難。再次，由于不断加强对社員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改变了一部分社員那种进社后只管做工拿錢、不管社里事情的錯誤思想，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是合作社的主人，应当从各方面維護社的利益，和一切不良傾向展开不調和的斗争。

(二) 鉄床社的巩固与提高

生产上的轉折点

1953年是鉄床社发展过程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該社1953年的生产总值达到230万余元，比1952年112万元增长一倍多。社員数从159人增加到206人。每人年平均产值为12,586元，劳动生产率比1952年提高32.65%。自有資金也有很大的增长，到年底已达49万元，比上年上升两倍多。

1953年鉄床社能够迅速发展原因是什么呢？1953年是我国进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第一年。整个国民經济經過三年的恢复时期，欣欣向荣。就在这一年，由于城乡交流通畅，市場显著活跃，全国各地卫生、福利事业迅速发展，人民购买力也有很大提高。鉄床車具的銷售量因而成倍地增加，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現象。从鉄床社的内部來說，合作社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經确立，个体私有經濟已改变为集体公有經濟，这就能够調动社内一切积极因素，在較大的範圍内进

行生产改革、技术革新，以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同时，就在这一年，铁床社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民主改革、增产节约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社员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他们以实际行动积极开展“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的群众运动，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光荣任务。

在完成 1953 年年度计划和增产节约指标的运动中，铁床社紧紧抓住生产一环，依靠群众，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年度的生产狠狠地翻了一番。

首先，铁床社集中力量增加并改进了技术装备。他们根据生产需要和经济能力，添置了必要的新的机械和动力设备。这一年，电动机的马力数由 30 匹增到 70 匹，车床、冲床、钻床等各式机床增加了 13 台，连同过去的 9 台，共 22 台。同时，积极发动社员进行生产技术的改革，使生产效率成倍、成十倍的提高。例如车工楼阿华将手掀的压床改为电动压床后，不但节省了劳动力，生产效率还提高两倍；工人章德云将原用手工敲直角铁的一道工序，设计创制一架轧角铁的土机器来代替，使原来每天每人只敲 80 根提高到 800 根，增加了 9 倍，劳动强度还大大减轻；工人朱阿宝、蒋德焕二人将原用手工敲制的弹簧床上用的小钩子，改以冲床用模子冲后，就使原来每天每人生产 10 斤左右提高到 50 斤以上，质量还大大提高。设备的增添，技术革新的开展，为该社走上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道路，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其次，从原来以装配、修理为主的生产，改变为全能生产，并从一般产品发展为较为精密的产品。同时，进行了生产组

織的改革，改变了过去“个人独料”一件产品一人操作的生产組織，实行流水作业。这样就便于分工协作，提高技术熟練程度，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漆工組将生产人員分成毛坯、底子、面子三部分的流水作业后，日产量从60只提高到84只。拉管組实行流水作业后，日产量从1,610尺提高到3,498尺。

再次，大力进行技术培训，采取师傅带徒弟，如开办以机械理論知識为中心的技术講座等方法，培訓技术力量。一年中，共培养了技工135名，使該社的技术力量基本上能适应設備增添和技术改革的需要。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还建立和健全了生产責任、产品檢驗、收发保管、工具領用、小組民主管理、机器保养、艺徒培訓等一系列生产管理制度。鉄床社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由此大大提高了一步。因此，这一年是鉄床社在生产上的一个轉折点。

1953年冬天，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綫公布了。鉄床社社員欢欣鼓舞，他們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同时也感到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中，作为一个先行单位，应该負有多么重大的責任！

工資改革

鉄床社机器設備不断更新，社員技术熟練程度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快的增长，但是工資制度的改进，沒有相应地跟上去。到1954年下半年，出現了平均工資偏高和一部分工資輕重倒置的不合理現象，造成社員相互之間不团结，影响了社員的生产积极性。

鉄床社原来分小組計件与計时两种工資制度。当时最高工資达 157 元,最低 50 元,相差悬殊。平均工資为 92.86 元,已超过了相同行业、同等条件国营企业的工資水平。同时,計时工与計件工之間也有矛盾。如車工張才良原是鉗工朱阿宝的徒弟,由于师傅計时,学徒計件,就出現学徒比师傅工資高出 30 元的不合理現象。由于这些不合理的現象,影响到合作社的积累和国家劳动工資政策的貫徹,也影响到社員群众学习技术的进取心,助长了社員追求高額工資、只求数量不顧質量而造成原材料大量浪費的現象,对生产极为不利。

为了糾正这些不合理的現象,1954 年第四季度,鉄床社进行了工資改革。在工資改革中,发动社員算了五笔帳。这五笔帳就是:算政治上的翻身帳,算生活改善帳,算国家对合作社的扶助和优待帳,算合作社和国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及对国家的貢獻帳,算合作社的前途帳。通过对比算帳,社員清楚地認識到工資过高不合理,对国家、对合作社都极为不利。在此基础上,制訂和实行了按劳取酬的等級工資制度。

通过工資改革,基本上消除了計件工工資过高的不合理現象,計件工和計时工大体上取得了平衡。平均工資从改革前 92.86 元調整为 59 元,貫徹了合作社工資收入不高于同行业、同条件的国营企业水平的工資政策。这些不合理的工資糾正以后,一年就可以增加合作社 78,000 元的积累,降低产品成本 3% 左右,这就为进一步打开产品銷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証。同时,通过技术等級的評定,許多社員感到了自己技术低、本領小,因此自动提出向有技术的老师傅学习技术,扭轉了过去沒有技术照样可以拿高工資的錯誤观念,过去不分次

廢品和返工修理而照常拿工資的現象，也改變了。經過工資改革，合作社的經營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合作社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提高。

加強民主辦社教育

鐵床社建立起來以後，在黨和國家的關懷和哺育下，很快就成為手工業合作化運動的一面紅旗，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視。許多報章雜誌相繼刊載專文介紹；國際友人和各界人士陸續前往參觀訪問。從鐵床社來說，這種情況固然值得興奮鼓舞，但也助長了一部分同志的驕傲自滿情緒。有的看到合作社有了這樣一份家業，認為都是自己辛辛苦苦白手創造出來的，沒有看到黨和國家的領導與扶助是合作社得以發展的主要因素；有的認為合作社已經辦得差不多了，沒有什麼可以再發展了，開始滿足起來；社干之間為了爭名譽爭地位，有的鬧不團結，相互不服氣。同時，鐵床社幾年來購置了大批新廠房和機器設備，資金積累迅速增加，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社員生活已不象建社初期那樣艱苦了，於是資本主義經營思想和經濟主義思想逐漸抬頭。有些社員為了貪得超額工資，就追求產量，對工作挑精揀肥，不顧產品質量，甚至違反操作規程，造成多次返工修理的不良現象。工傷事故也連續發生，1955年上半年發生的工傷事故就有24起，耽誤156個工作日，損失1,913元。社員向社里伸手借錢的現象也很普遍，約有半數人或多或少向社里借了錢，合計金額達4,000元。最高的有300元，要三年才能還清。某些社干的資本主義經營思想比較嚴

重，表現在追求利潤，盲目承接業務，越多越好，寧願完不成，脫期罰款。有時他們把自己不會做的產品也接了下來，又不好好研究，結果害了人家也害了自己。如承接 60 公分臥式高壓消毒器一批，由於自己技術水平低，產品質量差，出廠後經常接到消費者的批評，社里派人出去修理，除工時不計外，單費用就損失 1,000 多元。

1955 年初，全市手工業合作社開展了民主辦社教育運動，鐵床社列入了全市三個重點先行社之一。在黨委和上海市手工業聯社工作組的具體幫助下，從檢查總結 1954 年工作入手，密切結合生產，開展了民主辦社教育。首先採取自上而下的總結和自下而上的檢查相結合的做法，肯定成績，揭露和批判缺點。並根據先易後難的原則，邊提邊改。同時通過具體事例，幫助社員算細帳、對比，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在社員思想認識提高的基礎上，再發動大家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自我教育的目的。當時主要批判了社員和社干的驕傲自滿情緒。如有的社員說：“以前總認為我們是三把榔頭起家，現在認識到如果沒有黨的領導、政府的關懷和國營企業的大力扶持，不要說三把榔頭，就是三部沖床也起不了家。”三個理事主任不團結，也在社員的幫助下，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思想見了面，解除了疙瘩，增強了團結。

在民主辦社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又開展了以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節約原材料、降低成本為中心內容的全面節約運動。由於社員們的積極響應，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節約原材料方面，原訂 1955 年全年指標為 20,691 元，實際超額完成 128.17%。如漆工組推行了“疊噴法”，實行定量領料，回收

底脚漆重調再用，打破了“漆糊涂”的陈腐观念。增加品种方面，試制成功后投入生产的有煮沸消毒器、万能骨科床等10余种。改进技术方面，較重要的就有11項，增加收入近三万元。如錢榮初創造了拉管自动来回鉗，操作由二人減为一人；金富錦将大脚螺絲眼改为机器攻后，八个月节约4,628元。培訓技术力量方面，号召向老工人学习，签订了25对68人的师徒合同，分輪訓和边做边学两种方式进行，使徒弟的技术普遍得到提高。生产管理方面，改变了原来报表龐杂但又不能反映生产过程的缺点，建立了必要的原始記錄制度，并加强了小組生产的作业計劃，逐步做到計劃生产。

毛主席教导我們：“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鉄床社的經歷是一个很好的証明。当一部分社員看到自己的社順利地发展壮大时，曾一度沾沾自喜，驕傲自滿起来，因而使該社在前进道路上受到了一定的挫折。后来在党和上級联社的及时帮助下，通过整頓，克服了自滿情緒，才又繼續向前发展。这一教訓告訴我們，只有听党的話，保持謙虛的态度，才能使手工业合作社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和整风

手工业合作化高潮

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各行各业的手工业劳动者敲鑼打鼓，欢欢喜喜地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鉄床行业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也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为了适应生产

上的需要，在上級社的統一規劃下，鉄床社陸續併進了第九、第十、閘北床業社和邑廟區的一些手工業者，共有 80 人。社員即由 1955 年底的 209 人增加到 289 人。這些新社員，大部分是同業中的獨立勞動者，也有部分小業主及其家屬。在一個巩固了的合作社里，適當規劃併進一部分新社員，不但可以適應生產上的需要，有利於合作社的進一步發展壯大，也有利於對這部分新社員的改造，並可使他們在老社員的帶領下，生產技術得到較快的提高。顯然，這是較早走上合作化道路的鉄床社的光榮任務。對這部分新社員來說，將他們合併到鉄床社去，也是符合自己願望的，但是當時他們比較直覺的還是因為鉄床社的條件較好，而忽視了加入鉄床社後，應如何徹底改造自己小生產者那種資本主義自發傾向，不斷提高政治覺悟等問題。從鉄床社來說，他們對於和資本家面對面進行鬥爭是有經驗的，因為他們在建社一開始，就和資本家“較量”過許多次了。但是在新的情況下，對待手工業生產者的改造問題，卻缺乏經驗，同時對手工業者應該進一步從政治上、思想上進行改造的重要意義認識也不足，因而在一部分新社員入社以後，沒有抓緊這一方面的工作，相反的卻對少數落后現象遷就多、教育少，部分新社員生產吊兒郎當、不遵守勞動紀律，並經常鬧個人問題的現象，也沒有及時得到教育。1956 年下半年，在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開放以後，有些社員對這種自由市場的性質認識模糊，因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開始有了某些滋長，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也表現得更為突出。鉄床社先後有 17 個社員為了追求個人收入，要求退社，還有一些人“騎兩頭馬”，他們白天在鉄床社生產，晚上為

“地下工厂”生产。其中大部分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进社的小业主和富裕的独立劳动者。直到政府采取措施，党和上级社及时提出加强对社员进行两条道路的教育后，自发势力倾向才得到了制止。

铁床社在1950年建社初期的艰难环境中，虽然受到同行业资本家的百般利诱，没有一人动摇退社；相反的在1956年社员工资福利相当好了的时候，却有人沉不住气，这一情况说明，在合作社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我们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可能减少或避免错误，使合作社顺利地、健康地发展。

伟大的整风运动

伟大的整风运动是紧接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政治上、思想上继续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斗争。

铁床社虽然早在1950年建立，经过了数次整顿巩固，贯彻了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精神，但是，资本主义思想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还经常影响着合作社，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从人的改造来说，政治上、思想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合作社发展壮大以后，社员群众在思想上滋长着比较严重的经济主义和本位主义，社的领导干部中普遍有着“三风”、“五气”，在高潮中併进来的部分新社员则对资本主义市场还有一些留恋。这就说明，开展一次全面性的整风、整社和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铁床社的整风运动，是根据党委的统一布置，在1958年初，从“反浪费、反保守”为起点开展起来的。通过大鸣大放、边整边改，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迅速形成了，不到几天，群众先后贴出大字报13,907张，大量揭露了合作社的浪费、保守现象。大字报揭露了该社在生产上、基建上、设备利用上以及费用开支方面的浪费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当时搁置未用的机器设备就有10尺龙门刨床、铣床、横臂钻床、冲床等20台。材料积压更为惊人，仅路皮、角铁、铅丝、铁皮和弹簧五种原材料就有8万余元；后来经处理的样品、模具价值2万余元。群众指出新建的厂房很阔气，厂内的行车道象“人民大道”，一座大礼堂化了十几万元，为了追求美观，礼堂地面磨石子工程化掉2,000多元；丽园路老厂一个“光荣榜”化了500多元。铁床社脱产行政管理人員有42人之多，占总人数的12%左右。行政科室机关化，社員反映：“过去找主任上車間，现在找主任要到写字間。”整风的火，很快地燒向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大字报还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展开了斗争，揭发了部分小业主和独立劳动者损公利己、私設地下工厂、跑自由市場的行为。

紧接着群众的大鸣大放，依靠群众进行了整改，十分之九的大字报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内就处理完了。管理人員太多，下放8人回到生产崗位上去，并規定了行政人員每星期三天参加劳动。一些产品零件及包装盛器乱丢的现象，也建立起必要的制度加以改变。特别是通过领导干部对“三风”、“五气”的自我检查，很快引起了群众性的自我检查和相互检查，人們

的思想很快有了转变。过去不相信整风运动能够推动生产的人信服了；过去生产吊儿郎当、连开会都不愿参加的落后社员变样了，有的还成为生产上的能手。

在“双反”胜利的基础上，又积极响应了党提出的“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号召。铁床社组织参观了附近的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这是一个比铁床社建立较晚，工种、设备大体相同的单位，它在整风后技术革新的干劲和成就很大，铁床社的社员在和南阳社相比之下，感到自己不能再以“老大哥”自居了，并认识到不能前进就要后退的道理，表示要虚心向人家学习。政治挂了帅，生产上的劲头就粗了。铁床社接着也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试制新产品的高潮。在一个季度不到的时间内，他们生产出电动离心机2,400台，1/16匹马达2,000只，搅拌器5,000只。这些产品，都是铁床社过去所不能生产的，现在，就为打开销路、解决业务困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整风运动虽然大大加强了铁床社的政治思想领导，改变了干部的“三风”、“五气”，出现了生产大跃进的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群众性的暴露问题，使铁床社的社员认识到，许多生产设备不能充分利用、资金大量闲置的浪费现象，还和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有很大关系，因为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还没有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范围，生产设备和资金是由社里单独使用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是铁床社在整改中抱出来的一个“大西瓜”。当然，这个“大西瓜”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四) 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新出現的矛盾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铁床社組織起来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后,充分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首先是大大发展了生产力。1957年底,該社已有314个社員,102万积累,162台各型机床和80余台馬达,248个三級以上的技工。生产总值也在不断增长,1957年达254万元,比1950年增加近10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17%。新产品也不断地增加,到1958年,該社的产品已增加到300多种,大大补助了国营工业的不足,发挥了有力的助手作用。其次,随着合作社的发展,社員物质文化生活有了相应的提高。1957年社員平均工资达到62.45元,与1950年相比,提高了71.5%。1953年起,社員开始享受公費医疗,社員疾病医药費一律由合作社負担,病假工資60—80%,因工負伤如数发給工資,并規定了社員的婚假、产假制度。此外,該社并积极举办社員文化教育事业,开办了业余学校,基本上消灭了占社員总数80%的文盲。再次,是合作化后,合作社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經過多次的政治运动,社員思想觉悟普遍有了提高,到1957年底,有29名优秀社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2名青年社員参加了共青团,并涌现出大批的先进生产者。

取得以上的成績,是与社員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但更主

要的是在于党的领导和国家在各方面的扶助。仅从物质支援上看,国家通过税收、原材料供应、银行贷款及贷款利息上,给予了很多的优待。根据历年来的资料,国家所得税优待 5,073 元,材料价格优待 231,194 元,银行利息优待 11,144 元,此外,国家还接给了大量呆滞物资和机床设备。八年来,该社所获得国家优待达 247,413 元,约占全部积累的四分之一左右。

但是,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原有生产关系不能适合生产力的情况,也逐渐暴露。1954 年以前,铁床社的产值是逐年上升的,但从 1955 年开始,产值反有下降的趋势。1957 年年产值 254 万元,为 1954 年 93%; 1956 年 179 万元,为 1954 年 65%。

现将该社历年来产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列表如下:

年 度	年 产 总 值	%	劳动生产率(元) (八年平均产值)	%
1950年7—12月	121,856	—	2,486	—
1951	799,715	100	8,599	100
1952	1,121,677	140	9,347	109
1953	2,303,261	288	12,586	146
1954	2,734,307	342	15,624	182
1955	1,839,417	230	10,632	124
1956	1,798,845	225	9,039	105
1957	2,546,934	318	10,792	125

造成铁床社产值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该社的主要产品——铁床,过去绝大部分依靠销售外地,运至甘肃、青

海等省，運費大、成本高。各地陸續興辦了一些床廠後，要貨量就漸漸減少。1954年以後，該社鐵床的產量逐年下降。1954年為21,232張，1955年為18,766張，1956年再降為15,759張。另外，在轉變新產品的過程中，由於技術不熟練，勞動生產率不高，也必然影響產值的降低。再則，1956年合作化高潮後，併入80余個新社員，抽調出50余個老社員去支援青海建設，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該社產值和勞動生產率有下降的趨勢。另一方面，1955年以後，鐵床社集體所有制的生產關係已不能完全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也漸漸顯露。具體表現在下列幾方面：

首先，從供產銷的安排上看。鐵床社雖然從1953年起就列為國家計劃物資的申請單位，原料按事先訂好的計劃，由國家統配。但產品的銷售和生產任務仍由鐵床社自己根據市場需要安排。在生產任務不固定、今天做這明天做那的情況下，供銷上的矛盾仍得不到解決。由於任務經常變動，產品品種不時改換，就影響到合作社和有關工業部門的生產協作計劃、銀行的貸款計劃以及鐵路的運輸計劃的銜接，而合作社內部的勞動組織也無法固定，生產管理上困難很大，難以進一步發揮生產潛力。鐵床社很早已經是一個機械化生產的大型合作社，內部分兩個車間，有拉管、彈簧等17個生產小組，全部按工序實行流水操作。由於鐵床社自己在市場上接受任務，來啥做啥，經常是“多了吃不了，少了又吃不飽”，人員設備上造成很大浪費；有的任務接下來只能滿足一部分工序的需要，另一部分工序的工人就要窩工，生產安排上矛盾很大。社里原有各種機床162台，大小馬達80只，安裝容量為104瓩，但自

1957年以來，實際利用率僅為27%。在人員安排上也一樣，1957年中，該社平均每天有33名生產人員可有可無，沒有生產任務，不少高級工却在干低級工的活。

其次，從資金、設備的利用上來看。鐵床社組織起來後，積累很快，至1955年底，自有資金已達97萬元，比1950年增加128倍。1955年，該社自備流動資金達58萬多元，而當時的經營實際需要，有40萬元即足夠應用，平均每天有17萬元的多余資金存在銀行里不用，1956年上半年增至20萬元。在機器設備上，該社為了適應產品經常變化的需要，設備的設置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設備甚至只用了一個很短的時期，因生產任務變化不得不閑置起來不用，如橫臂鉗床、龍門鉋床、插床等，很長時期被“打入冷宮”。1956年生產噴粉器以後，有九台沖床也派不上用場。這些資金、機器設備都是其他許多工廠企業、合作社迫切需要的，但是由於合作社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國家難以統一調劑使用。同時，在日常的人員調配上也有困難。如1957年該社遵照上級指示要調一個鉗工到十六黑鐵生產社，這個社員竟提出要把在鐵床社享受的各種福利加在他的工資上他才去，否則不去。類似這樣的情況，還不是個別的。

再次，從收益分配上看。社員、合作社、國家三者之間的矛盾也非常突出。社大了，生產發展了，合作社積累增加了，本來是件大好事，但有些社員竟認為合作社這個家業“是自己創造的，應該享受享受”。有些社員“傷疤好了忘了痛”，經常不斷地鬧工資福利，爭勞動返還金，工資高了還要高，福利好了還要好。有些社員為了追求產品數量，追求超額工資，竟不顧

产品质量，違反操作程序，阻撓修改定額；社里限制不合理的超額工資，还認為是合作社剝削了他們。在福利上，不少社員也是比好不比坏，比高不比低，不滿足于參照国营企业制訂的福利規定，年年提出新的要求。实际上，合作社的福利是年年有所提高的。例如1957年福利費支出达到工資總額的17.2%，大大超过了国营企业預提包干13%的規定。在福利項目的要求上，更是奇奇怪怪层出不穷，例如社里发了工作服、烤火費不算，有的社員还要求发皮鞋、汗衫、棉毛衫；噴漆車間有的社員認為，为了保护身体，光吃牛奶还不够，还要求增加魚肝油、猪肝、猪蹄膀等等。年終分紅(劳动返還金)时，社員和理事会关系格外緊張，为了分配比例爭吵不休，有些社員希望分紅分得愈多愈好，不滿意上級社关于分紅不得超过一个月工資的規定；有些干部則反映：“一到年关，日脚就难过。”

所有这些，說明了鉄床社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須設法解决这些新出現的矛盾。

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以上这些新的矛盾，一直苦恼着鉄床社的社員、社干們。但究竟根本問題在哪里呢？他們却是不甚清楚的。1957年，社里組織学习刘少奇同志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后，明确了一部分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可以发展为全民所有制的方向，全体社員和社干都非常兴奋，心里感觉亮堂了。不少社員开始認識到大家感觉最头痛的供产銷安排問題、社員和社干关系日益緊張等等

問題，其根本原因是集体所有制的限制。于是在社員、社干中展开了热烈的酝酿和討論。七月間，理事会第一次开会討論，一致要求打报告給上級社表示要求轉厂的心愿。社員們听了也非常贊成。

但也有一部分社員，他們虽然也同意轉厂，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对合作社却感到留恋不捨。也有不少社員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經濟主义思想，如有的社員认为轉厂可以，但是應該让大家多拿点鈔票，他們认为这个社是他們自己的，“沒有功劳也有苦劳，沒有苦劳至少也有疲劳”。有的社員对轉厂犹豫动摇，或者不同意轉。比如有人担心国营企业要求严格，怕轉厂后不“自由”；又怕国营工厂定額严，超額工資拿不到，而入工会还要交納会費，担心收入降低。还有的对取消分紅也有意見，认为“劳动返还”沒有了，“杀掉母鸡沒蛋吃了”。此外，也有人對理事会說：“你們把尺寸（意即能分多少紅）开出来，讓我們看看，合則轉，不合就不轉。”此外，个别的坏分子乘机散布不滿空气，企图混水摸魚，說什么“合作社过渡好比一把火燒掉了，国家把合作社搶去了”。总之，形形色色的思想都暴露出来了。由此可見，在轉厂过渡中，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思想的斗爭也是相当剧烈的。

党支部和理事会根据党和国家以及上級社的指示精神，认为鉄床社轉厂过渡的时机已經逐漸趋于成熟，于是抓住群众情緒，因势利导，在摸清社員群众思想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开始由理事会向社員作了动員报告，以后，又直接从党委和上級联社取得支持，請区委同志来社作了报告，着重解釋了合作社的发展前途、为什么要轉厂以及怎样

轉等問題，澄清和批判了社員中存在的一些糊涂觀念和不正確思想。經過反復討論，社員中一些不正確思想初步有了扭轉，據統計，當時堅持要求轉廠的約占社員總數的 60%，態度不夠堅定的占 35%，不同意轉廠的是少數。同時，在怎樣轉、轉什麼的問題上，社員中還有不少分歧的看法，很多人要求轉“中央國營”，少數人要求轉“地方國營”，但大部分人 unwilling 轉合作工廠。11 月又請上級聯社負責同志做了轉廠報告，指出手工業社轉國營工廠必須根據國家需要和社員自願，同時具備生產正常、行業有發展前途等條件。條件不夠的可以積極創造，思想不成熟的應充份醞釀。同時，報告中還適當地批評了某些社員中存在的驕傲自滿情緒，號召社員應當從思想上徹底解決問題，要求全社在轉廠過渡問題上做到“人人通、日日通、夜夜通”。

上級社為了比較徹底的解決社員思想問題，并使鉄床社為其他社樹立起良好的榜樣，曾在社員群眾中對轉廠過渡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思想教育。前後經歷了將近半年，大會、小會開了不少次，通過先進帶動落后、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工作方法，使上面暴露出來的問題，大部分得到了解決。

1958 年初，手工業系統的整風、“雙反”運動開始，很多社員連夜貼出大字報，表達自己要求轉廠的心願。有一張叫“等郎”的大字報說道：“新娘打扮完畢，轎子也已準備，只是請問郎君，為啥還不抬去？”該社一般的社員都已認識到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到集體所有制再到全民所有制是必然的事情，國營工廠無論哪方面都比合作社強。對個別思想落后的社員，進行了批評和幫助。先進思想與落后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少

数经济主义思想比较严重、气势汹汹要求分公共积累的人，受到大家一致的指责。这样，在群众的舆论之下，落后的社员开始转变，个别坏分子在群众中也完全孤立。领导上根据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动群众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经过反复酝酿，一再教育，最后大部分社员都贴出了大字报，一致要求转厂，并要求在整风整改中抱个最大的“西瓜”，即转变所有制。这时，转厂过渡问题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地步。根据群众一再要求，上级社负责同志就在1958年3月15日作了有关转厂政策的报告，并对铁床社资产处理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让社员们进一步考虑。当夜全体社员经过研究讨论，一致要求转厂，并提出越快越好、说办就办。有人还提出不要劳动分红，以示决心，情绪非常高涨。

从这时起，铁床社即进入正式转厂过渡阶段。3月23日理事会最后一次向社员作了工作总结报告，宣告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成立了以原理事会为基础并由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转厂委员会，代行行政职权。对铁床社资产的处理，除股金全部退给社员，当年的劳动返还金按七天半基本工资提取分配，以及按社章规定分配盈余外，铁床社资产全部转为国家资金。后来，根据上级指示，接着文和中华五金社进行了合并，并在两个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市地方国营上海自行车三厂。其后，按国家需要，在自行车行业经济改组过程中，又并入18家公私合营工厂（中心厂）。至此，铁床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历史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合併轉廠后的新氣象

轉廠以后，過去合作社存在的那些矛盾，基本上都解決了。供產銷納入了國家計劃，生產按照國家計劃進行，供銷由國家進行統一安排，生產實現了專業化。資金、廠房、設備、勞動力都由國家統一安排和調劑，過去那種無法安排和調劑的情況已經不存在。很早以前就不需用的龍門鉋床、插床、橫臂鉋床等，調給了國營機器修理廠；而急需的摩擦壓力機等，也已由其他單位調來使用。該廠為了支援鋼帥升帳，還抽調勞動力 190 人。而支援基本建設等方面，也抽調了勞動力 100 人。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由手工業合作社轉成國營工廠，比起國家另行投資新建、擴建為好。銑床社轉廠時共有資金 100 多萬元，人員 300 多人，其中三級以上的技術工人即達 248 人。而國家建立這樣一個新廠就要投資 300 多萬，基本建設需要一年以上，培養技術力量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因此，這樣做是充分貫徹和體現了“投資少、建設快、收效大”的要求和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

從生產上看，1958 年國民經濟大躍進的一年中，在黨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上海自行車三廠超額 4.12% 完成了國家計劃；勞動生產率每個工人為 11,553.36 元，較 1957 年銑床社勞動生產率 10,792.10 元又增長了 7.05%。該廠在試制新出口產品“鳳凰牌”高級輕便車過程中，原來的社員在黨委的領導

下，貢獻了他們的技术特长，試制成的产品式样新穎漂亮，質量也不錯，在工业部門中得到好評。1958年在工厂統一安排下，原来合作社的社員們和兄弟社兄弟厂的职工一起，發揮了高度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干劲，为国家生产的自行車达15万余輛，其中一部分供应出口，为国家爭取了不少外汇。

轉厂以后，上級加强了这个厂的領導力量，派来大批优秀干部。社員一般都参加了工会，成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經常接受党和工会的教育，因此，党的領導加强了，社員群众的思想覺悟也大大提高了。在技术革命以及全民炼鋼等运动中，他們都以冲天的革命干劲为社会主义建設貢獻着自己的力量，創造了不少先进的事迹。过去小生产者那种狹隘、自私、落后的思想意識也得到了比較彻底的改造；自由散漫、經濟主义、本位主义等等思想也为工人階級的組織性、紀律性所代替。有些社員說得好：过去对待工作是斤斤較量，現在是忘我劳动；过去是挑肥拣瘦，現在是服从分配。

結 束 語

解放以来，鉄床社发展变化的过程表明，我国广大的手工业劳动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是完全能够摆脱資本主义影响，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鉄床社九年来的光輝道路，也說明了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再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必要性。集体所有制比个体所有制有着很大的优越性，解放了个体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縛，合作社的生产得到了迅速

的发展，社員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全民所有制又比集体所有制有着更大的优越性，合作社那种由于集体所有制所产生的局限性以及内部、外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只有通过轉厂过渡，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从而使生产力飞跃发展，适应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的需要，并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鉄床社九年来的光輝进程，再一次証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正确，并为集体所有制經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新安棉織生产合作社的变迁

上海市新安棉織生产合作社在全市手工棉織合作社中，是一个成立較早、規模較大、机械化程度較高的单位。1958年春天，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为了进一步适应发展需要，与本市大部分手工业合作社一样，经过从个体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一次巨大变革之后，繼續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历史任务——过渡为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国营工厂。

地方国营上海新安棉織厂于1958年6月10日正式成立，現有职工289人，自有資金23万元，厂房近80間，占地3,700平方公尺。机器設備有：电力織布机91台，电力經綸車、籽子車、筒子車各三部，手拉毛巾机10台，大小馬达24台，馬力66匹。主要产品有寬帆布、条府綢、灯芯絨、手帕坯布和大浴巾等。1958年产值188万元，平均每人年产值6,300余元，已初具一个中型棉織厂的生产規模。

新安棉織社整整有8年历史，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它从个体到集体、从低級到高級、从分散到集中、从手工到机械，最后，又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新安棉織社发展过渡中的每一变化，典型地、深刻地反映了党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針的重大胜利，有力地說明了是党引导着

广大手工业劳动者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永远摆脱了分散、落后、贫穷的生产状况和生活处境。十分明显，这条道路是手工业者通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一) 建社前后

“从鸡叫做到鬼叫”

新安棉織社基本上是棉織业的个体手工业者組織起来的。解放前，他們大都集中居住在徐家汇虹桥路一带，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生产經營主要依附于商业資本家的委託加工，遭受着商业資本家的残酷剝削。每年秋冬旺季，他們夜以繼日連續劳动达 16 小时，“从鸡叫做到鬼叫”。但是工織十分微薄，不足糊口，一年辛苦，到头来仍然两手空空。初夏开始，淡月到来，机空无活，帮工无主。他們担柴拾菜、捞魚摸虾，借以維持饑殍不繼的貧苦生活。稍有几小包棉紗資金的独立劳动者，也常因“本小腿短”，摆脱不了“大魚吃小魚”的厄运。因为当时手工織布交易市場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資本家在“沪台旅社”組織的交易市場，另一个是在北海路一带由小商販集合的交易市場，由于前者資本家拥有雄厚的資金和广闊的銷售門路，小商販收购了手工业者卖出的一匹、二匹少量棉布后，成羣地轉售于資本家，因此資本家完全处于手工棉布交易市場的支配地位。他們利用小商販控制着手工业者的貨源，一般以低于市价 30 % 左右的收购价格不断地榨取手工业者的利潤，而小商販从中一經手，又对手工业者的利潤剝去

“一层皮”。手工业者一般只有几匹布的周轉資金，为維持生計，不得不忍受資本家和小商販的层层剝削，二三天織出的一匹布，收入只有一元多一点，禁不起几次反复，大都陷于負債、破产。

解放前，手工业生产分散，生产季节性大，同时，設備簡陋，技术落后，資金很少，无力和資本家竞争，这就成为他們不得不依附于資本家并受其盘剝的主要原因。解放后，他們迫切要求摆脱商业資本的控制，改善生产生活境况，这原是手工业者由来已久的愿望。

沉痛的教訓

上海解放初期，党和政府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經濟，迅速医治战争創伤，对手工业生产及手工业者的生活，作了大力扶植与照顾。1949年9月間，即在徐家汇虹桥路附近，組織了“手工业棉織联营小組”，由人民銀行貸款，花紗布公司发售棉紗、收购成品。1950年3月間，又进一步組織了“联营处”，人数由几十人增加到200余人。这样，手工业生产有了恢复，手工业者生活有了好轉。这种做法，在当时解放不久，为了維持手工业生产、照顾手工业者生活，未始不可，但是并不能达到从生产上对手工业者进行改造的要求，而且，“联营处”在組織对象上，也沒有将手工业独立劳动者与資本家分別对待，結果，領導权很自然地为那些“能說会道”的資本家所篡夺。为时不久，“联营处”的正副主任就互相勾結，盜用承接加工棉紗70包，雇工織布，私自販卖。會計員乘机貪污棉紗108包，生活

腐化。小組長利用職權盜竊棉紗 100 包，攞為己有，打算另立門戶。一時間，“聯營處”被搞得烏煙瘴氣。在這樣的情況下，“聯營處”自然逐漸由癱瘓而至瓦解。

“聯營處”解散的沉痛教訓，給手工業者上了一次生動的教育課。這件事，極其明顯地說明了“組織起來”不僅是形式問題，更重要的是包含着極深刻的階級鬥爭的內容，手工業勞動者必須要有自己的經濟組織。

重新組織起來

一批從“聯營處”解散下來的手工棉織業的獨立勞動者，為了擺脫貧困，經常緬懷着聯營初期由於國家扶助而使生產恢復、生活安定的境況，迫切要求重新組織起來。就在 1951 年 3 月間，在上海市聯社領導下，54 個手工業工人和獨立勞動者，開始醞釀籌備組織徐匯棉織生產合作社（即新安棉織社的前名）。

由於接受“聯營處”失敗的教訓，他們已認識到哪些人可以入社，哪些人不能放他們進來。在吸收對象上他們規定：入社的人，一定要自有或租有一台木機，自己參加勞動，而且不僱傭工人。這樣就把那些“搖搖膀子，只說不做”的人堵在門外了。就這樣，他們慎重的吸收了 53 個新社員，連前共 107 人。這對鞏固組織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1 年 3 月到 5 月，由於棉花供應不足，市場棉紗供應較緊張。但是，他們辦社的信心毫不动摇。生活困難，他們就四出挖菜拾草，經營各種副業來維持生活。在極度困難的情況

下，每人還繳納了入社費 2 角，湊足 21 元 4 角，作為開辦費，並規定每晚用兩小時學習社章。當然，也有少數人信心是不足的。如有人說：“合作社是座空廟，只有學習，沒有布織”；“學習不能當飯吃”。也有人看苗頭的想法，抱着“最多損失 2 角錢”的態度。所有這些混亂思想，經過上級領導的解釋和群眾的辯論，逐漸得到了澄清，並取得了統一的認識。他們明確了合作社的性質，初步看到了合作社的前途，堅定了信心。1951 年 5 月 13 日，即正式成立了合作社的籌備會。

籌備會成立後，棉紗供應情況好轉，上海市聯社陸續代為承攬業務，兄弟社又大力支援——上海市裝訂生產合作社首先委託加工土布 50 匹，並預付部分工繳。資金活絡了，生產也由原來每戶 2 到 3 匹增加到 16 匹以上。社員每月收入一般在 50 元左右，生活也趨於穩定。到年底，合作社一算帳，還積累了 6,500 元。這一年的年底，他們結束了籌備階段，正式成立了生產合作社。

（二）社的鞏固提高

兩次考驗

合作社初步辦起來了，而且辦得不錯。這件事的本身，比什麼宣傳還有力。虹橋路一帶的手工棉織戶把辦社的事很快傳開了，人人爭着要入社。不久，社員就從 107 人增加到 320 人。合作社社員不斷增加，固然擴大了社的生產力量，但是，由於合作社的性質和前途，並不是每個人都已認識清楚，因

此，也就产生了不少问题。比如，有的人说合作社是“大老板”，合作社的积累是“剥削”；有的人稍有困难，就向合作社伸手，一不满意就大发牢骚；有的人认为参加了合作社，找到了“靠山”，生产就吊而郎当；也有一些人把合作社看做是另一个“联营”想趁机捞进一把，说是“借伞躲雨”；更多的是只知干活拿钱，百事不管。这些思想如果不澄清，就不能提高社员的思想认识水平，那就必然会经不起风吹草动，对合作社的巩固发展极为有害。

1952年初，新安棉织生产合作社在业务上一度出现了暂时的困难。就在这个时候，那些“借伞躲雨”的社员发现合作社没有苗头了，就说：“人家停工有工资，合作社停工喝西北风”，起哄退社，于是一下子退出了35人。没有退社的社员中，也有些人洩了气，请假的请假，回乡的回乡，改行的改行，有的赶忙去办失业登记，预先挂上一个号，有的甚至不辞而别，一去无踪。整个合作社象大江中的小船一样，动荡不安起来。坚持到底呢还是大家散伙？严重地考验着每个社员。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批发起组社的五十几个老社员，以坚定的态度接受着这个严重的考验。他们吃不上饭，宁肯吃六谷粉、拣菜皮、拾螺蛳，想尽一切办法来克服自己生活上的困难。他们说：“单干的苦吃尽了，‘联营’又散了伙，我们这批人，除了合作化，没有别的路。”他们坚决办好合作社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没有一个人离开合作社。他们的模范行动和坚定的信心，影响和团结了一些社员。

1953年秋天，市场活跃，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一般小业主每织一包纱可以获利10余元，有的好赚个对本利。他们扬

言“社外織一月，社里忙一年”，以此誘惑合作社的社員。部分社員眼睛紅了，陸續又退走了30余人。但是，立場堅定的社員，不為所動。正如卜正茂說：“你們鈔票賺得再多，我也沒眼看！”響亮地回答了資本家的利誘。

上級社針對這個合作社的退社問題，結合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領導開展了一次社章教育，着重教育社員端正對合作社性質和社會主義前途的認識。另一方面，積極與有關部門聯繫，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這樣，除了一些看不清合作社前途的人退了社以外，留下的224人更加團結地把合作社堅持了下來。

純潔隊伍，整頓組織

社員們經受了兩次考驗，認清了前途，加強了辦社的信心，生產開始正常起來並逐步向前發展。1953年產值達1,325,000余元，比1952年產值963,000余元提高了34%。平均每人年產值也由1952年3,700元提高到1953年的5,820元，提高了57%。

合作社建社初期兩次發展社員中，雖然對入社對象作了一些規定，如規定雇工剝削、自己不參加勞動的人不能入社等，但是手工業這個社會階層，情況比較複雜，隨着合作社社員的發展，自然也混進了一些社會上的壞分子。他們利用能說會道，騙取了群眾的信任，掌握了合作社的領導權。他們平時自說自話，大權獨攬，不按社章辦事，不發揚民主，利用手工業者落后的行會思想，相互拉攏，搞小集團、小幫派。如虹橋路

是一派、姚家宅又是一派。因此，社干之間、干群之間互不團結，終日鬧無原則紛爭，吵吵嚷嚷，理事會、監事會簡直成了他們的“獨立王國”。這樣，合作社中不僅一時邪氣上升，民主辦社的原則無法貫徹，而且誰領導誰的問題，也尖銳的暴露出來了。1952年合作社進行醞釀改選時，監事主任王錦標是社內一霸，目無組織，不滿意上級輔導這次改選工作，借口開會未通知他，狂妄地說：“我不在家，你們開會，不行。”甚至氣勢汹汹地掀柁子，要打上級社派來的工作組幹部。理事主任王躍初耍弄手腕，瞞上壓下，篡改候選人名單，破壞改選，使改選工作不得不半途而廢。他們對上級社的耐心教育認為軟弱可欺，此後更是變本加厲。理事主任不請示上級，不通過群眾，擅自修改上下班的鐘點，私漲工資，寫無頭信打擊積極分子，等等。當時理事會、監事會中的12個幹部，其中有8個是壞分子，占整個領導幹部的66%。而少數正直的社干，勢單力薄。這些猖獗合作社領導的壞分子，還利用職權，盜竊合作社的財產。監事主任把社里原料偷去織成50打圍巾，貼上新安棉織社的商標出售；理事主任一次盜賣棉布20匹貪污中飽。一時上行下效，有一部分社員也有貪污盜竊的行為，嚴重地危害了合作社的利益。

1953年9月，在黨的領導下，合作社開展了民主改革運動。廣大社員群眾通過新舊社會回憶對比、訴苦挖根等一系列的教育，眼睛擦亮了，階級覺悟有了提高。在上級的支持下，群眾發動起來了，他們紛紛揭露壞分子的罪行，進行說理鬥爭。最後，終於打掉了壞分子的囂張氣焰，使他們低下頭來。社員們行使民主權利，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撤了下來，同

时把忠实于合作事业、为群众爱戴的一些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独立劳动者选为合作社的领导人。合作社的领导权问题，至此才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经过民主改革清查出来的坏分子，陆续都作了应有的处理，从而纯洁了合作社的组织。社员群众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有四个社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五个青年参加了青年团，大大改变了新安棉纺织社的政治思想面貌，为进一步巩固发展合作社的组织提供了政治条件。

“鼓不打不响，理不讲不明”

通过处理退社事件和民主改革，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确有很大提高。合作社几年来在国营经济和上级社的扶持下，生产节节上升，积累也不断增长，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似乎也渐渐少了。但是由于社员们过去长期是独立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为个人打算较多，他们入社后，虽然受到了一些集体主义教育，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未根除，因而在生产较顺利的条件下，社员们个人主义、经济主义的思想，又有了新的抬头。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上求量不求质，只追求个人收入增加，不顾合作社的信誉。这种现象到1954年发展到了高峰。原来，合作社建立起来后，大部分社员还是分散在家里生产的，合作社发原料收成品，生产管理制度不严格。一部分社员乘此机会，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如织出来的线嘍吱一般都要扣掉总经头2—4根，严重的达16根之多，至于重浆潮湿更比比皆是。产品质量不断下降。该社送出的女方巾，经中国百货公

可檢驗出不合規格的数量占到41%。就在1954年的第二、三季度，合作社的次品賤價損失即達2,600余元，嚴重地損害了國家和合作社的利益。

社員們把偷工減料弄到的多余棉紗，織成帳子布、被夾里、衣料等自己穿用不算，有的還出賣牟利或餽贈親友做人情。特別危險的是他們沒有認識到這種損公利己的行為的嚴重危害性。他們以為自己技術高明，為能夠把一定量的紗織成更多的布而沾沾自喜。他們說：“紗少了要自己貼，多了當然是自己的。”公然認為這是天公地道，理所當然。

這些現象與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自由主義態度是分不開的，因為領導干部中也有人認為貼紗由社員負責，余紗就應歸社員，因而放任自流，落得做個順水人情。當時也有少數社員曾把部分多余的紗送回合作社，而社里的負責人却馬馬虎虎不予受理。這樣致命的弱點如果不及時迅速改變，毫無疑問，勢必給合作社帶來垮台的危險。

1955年初，上級社號召開展結合民主辦社的教育運動，指出他們必須着重對資本主義經營思想進行批判，並幫助社員算帳對比，算國家對合作社的扶持優待帳，算個人和合作社對國家的貢獻帳，對比手工業勞動者在新舊社會的地位和前途，使社員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行為帶給合作社的危機和社員切身利益的关系。通過這樣的教育，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帶頭暴露了自己的錯誤思想與行為。社員們在社的領導和黨團員的幫助下，也紛紛解除思想顧慮，自覺地作了交代。社員們說：“鼓不敲不響，理不講不明。自己穿衣服應該拿錢買布，國家的財產理應退還。”結果就實事求是地核實了應退數字，逐步還清。

据统计，当时仅就交回合作社余纱余布折算金额，即有3,700余元。合作社几年来的一个大窟窿，至此给堵住了。

通过余纱余布的处理和实际教育，社员们进一步划清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界限，明确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树立集体主义的思想，从而进一步发挥了生产上的劳动积极性。1955年每人年平均产值比1954年增长6.6%。社员们在几次教育和斗争中，逐步把个人利益和合作社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统一了起来，加强了集体主义观念，为合作社走向集体生产打下了思想基础。

集中生产和机械化

新安棉纺织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四年多，直到1955年上半年，基本上还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只是按照居住的远近，分别组成了21个小组，作为合作社和每一户之间的桥梁。生产工具沿用着原始的手拉脚踏的木制抛梭机。合作社的这种落后生产方式，显然与组织起来以后新的生产关系有着尖锐的矛盾。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 生产力低下：以1954年生产綫嘍吱为例，分散生产户每台机月产20匹，与同一个社中已经集中生产的两个电机生产小组比较，劳动生产率仅及62.5%。

(2) 劳动强度高：手工棉纺织业的个体户，生产时间一向很长，旺季时一般生产时间是13—14小时。组社以后，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为了不致影响收入，每天生产的时间仍然很长。加之浆纱、经纱都要自己动手，年老的社员更感体力

不支。

(3) 質量无保証：社員們居住条件很差，一般是屋小人多，雨漏烟熏。漿紗虽然可在屋外操作，但下雨天就无法进行，大热天太阳光强了又易变质。而且手工織造，由于体力关系，布的质量难以控制。因此，高档貨不能承做，产品质量差。

此外，分散生产对于社員的管理和领导都很困难。合作社里分配各戶的任务一般以机台数为准。如果社員生病或遭到其他事故，則无法代替生产，有时就要影响交貨期限。更重要的是由于居住分散，各自生产，社員受政治思想教育的机会較少。合作社的各项決議和措施也很难向下贯彻，更不能發揮社員在生产上相互监督的作用。小生产者的資本主义自发傾向和經濟主义思想也由此容易滋长，影响对他們的思想改造。

合作社分散生产的低級形式，阻碍了合作社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也影响社員生活的改善，特别是那些单身的工人社員。他們說：“参加合作社两三年了，还要租人家的屋子織布，搖紗、經紗都要請教別人，吃飯也要在人家家里搭伙，每次工資到手，几处一分就光了。”他們把分散織布說成是“白織”，要求集中生产也最坚决。

早在1952年，該社已有24个社員經理事会同意，組織了两个集中生产的小組，他們自己在外面租了几部电力机进行生产。产量高，收入好，这两面旗帜对社員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53年、1954年都有不少社員提出集中生产的要求，理事会也感到有必要准备条件，逐步集中。因此，在社里稍有积累时，便設法购进48台大工厂已經不用的鉄机、电

动机和其他一些設備，以備改制后供集中生产之用。由于厂房和电力問題，直到1955年下半年在上級社大力帮助下才陸續实现。

要求集中生产、实现机械化，已經成为社員共同的愿望，但是200多人的大社一下子集中起来，使用新的生产工具，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里除了織造部門的社員必須懂得和熟悉电机的性能外，还要考虑到由手工生产到电机生产多余下来的劳动力如何調度；社員集中生产以后，原有的輔助工、家属劳动力如何合理安排等等問題。如果处理不当，必然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生产和社員的收入。

合作社的領導，在处理这些問題上，不是沒有困难的，但由于他們紧密依靠群众，有事与群众商量，困难自然就少了。譬如在新厂房內装修电力鉄机时，除向国棉十五厂請了工人老大哥来指导外，每天还需要不少劳动力，如果社員都停下来支援，又会影响生产，社的領導把任务向群众講明后，社員提出了按生产小組組織义务劳动的办法，于是装修工作很快完成，做到了生产扩建两不误。又如集中生产以后，实行二班制，須要把多余的織造工改做搖紗工，但織布工資高，搖紗工資低，究竟派誰去呢？社的領導召开了社員大会，要大家討論，同时提出要求每个社員發揮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从合作社的前途着想，做到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服从組織分配。会上很多社員自动报名，要求調做輔助工。經過慎重研究，在織布工中調出一部分人做輔助工，但考虑到他們的經濟情况，决定对調做輔助工收入降低的給予临时补助，这样問題就解决了。

新安棉織社的集中生产和机械化的工作做得是比較細致的，但是在这个变动过程中，政治思想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也會发生过脱节的现象，先后发生了一些問題。例如社員集中生产以后，生产時間減为七个半小时，劳动强度也減輕了，大家喜笑颜开。但是社員集中生产后，在用料上和过去发原料收成品就有了不同。过去原料用多用少要自己負責。而集中生产以后，緯紗織少了，不合規格要扣工資，于是就产生了浪費現象。他們觉得反正“一个鍋里吃飯”，多用一点与自己无关，落得“一身輕松”。因此，1956年全社由于产品超重和多緯等原因浪費的紗达17件，值16,000余元，相当于合作社全年的盈余。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使合作社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再則，一部分先行集中生产的社員，由于管理制度沒有跟上，生产時間吊而郎当，产品质量就不高，并且經常到期交不出貨。集中生产以后不到半年時間里，延期罰款就达3,400余元。而这些思想行为，只要加强对社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新安棉織社由分散到集中和由手工操作到机械化，使合作社的生产前进了一大步。1956年集中生产以后，全年产值較1955年分散生产时提高41.1%；每个社員的年平均产值1956年較1955年提高32.38%，为合作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打下了較穩固的物质基础。

整风整社全面跃进

1956年下半年，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場开放以后，社会

上掀起了一股“走自由市場”的歪風。雖然這股歪風很快就制止了，但是有些社員曾經受了這股歪風的影響。有的嚷着要退社，有的白天在社里是社會主義、晚上在家是資本主義。新安棉織社的社員，絕大部分來自獨立勞動者，但是他們也是私有者，他們的私有觀念較濃，為個人打算較多。雖然集中生產以後，生產機械化了，但原來的木機仍然放在各人家裏。這時候有些社員紅了眼，就在家里偷偷摸摸干開了。1957年，社員到市場上收購廢毛自己織造的約占全社人數的20%。他們之中，有些人人在社里，心在家里，自由散漫，無心生產；下午不到下班時間，幾個搞“地下工廠”的社員就一溜煙跑出去了。

另一方面，社的領導幹部，隨着合作社的發展壯大，也逐漸產生了一種“差不多”的思想，他們認為新安社一家一戶組織起來到現在，和其他社比較已經不錯了，因而安於現狀，生產上改革很少，管理制度鬆弛，生產計劃完不成，質量下降，產品積壓，……。

1958年春，偉大的整風運動在新安棉織社開展了，在黨的領導下，全體社員熱烈投入了運動，通過大鳴大放、大辯論，全社共貼出1萬1千張大字報，對領導幹部的“三風”、“五氣”和生產管理上的混亂現象進行了大膽的揭發和批評。譬如有人揭發：社里多餘20個勞動力一年多不處理，每年要付出8,000餘元工資，另外倉庫里却放置着12台布機長期沒有使用。社的領導根據群眾的意見，立即進行了檢查和改正，把一部分應當下放的生產管理權限下放到車間小組去，領導幹部並且跳出事務主義圈子，做到定期下車間參加勞動。倉庫里的12台布機，也很快開動起來，投入了生產。

整个整风学习的过程，是社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当他们看到领导作风有了改变，就满意地说：“火车头开动了，我们要跟上去。”群众贴出的大字报不仅批评领导，而且也作了自我批判，有些人还严厉批判了自己过去搞“地下工厂”的可耻行为。小组会上他们还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很多人从回忆对比中进一步感到了合作社的可爱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是自己的大恩人。社員卜正茂織了一辈子布，解放前吃尽苦头，沒有布織时，挑柴过活，弄得骨断腰伤。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他到“上海滩”謀生，因沒有身分証，經常躲在枯井下面，沒有房子織布，就租用別人的猪棚。解放后，他参加了合作社，現在已經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猪棚翻造成了瓦房。他体会到这些都是共产党給他的好处。通过群众教育群众，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严肃的批判，社員們紛紛表示要拔掉白旗，插上紅旗。1958年是国民經济大跃进的一年，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深入人心，社員們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光輝的前景，社会主义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

通过这次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很大改进，干群之間的团结加强了，必要的生产管理制度有了进一步改进，社的組織也得到了进一步純洁。更重要的是通过爭辯，該社內部“两条道路”的問題基本上得到解决，社会主义思想陣地获得了进一步巩固。思想一經解放，社員的劳动积极性普遍高漲。在整风整社的胜利基础上，掀起了大鬧技术革命的高潮。为了武装自己，社員們白手創辦了一个翻砂工場，把倉庫里12台殘缺不全的“老爷”机器改

变成有用的电力布机，投入生产；同时他们还创制了括浆机、驗布机和碼布机，成为长宁区所属手工业合作社技术革新、自己武装自己的一面紅旗。在轰轰烈烈的全民炼鋼运动中，这个社全体社員都动員起来了，他們的口号是“炼鋼、生产、学习三不誤”。党支部書記开会要大家在炼鋼期間保証八小时睡眠，社員雷正荣馬上递上条子說：“首先你要带头！”全社社員就是这样相互关怀紧紧团結在一起，夜以繼日地为鋼而戰。終于在短短不到一个季度的時間里，他們用土法炼出了65.5吨鋼，超額完成指标，在长宁区被評为先进单位。

炼鋼的同时，在織布生产战綫上也是很緊張的。这个社1958年下达的必成指标要比1957年增加32%。大鬧技术革命同时，抽調了部分人員搞翻砂工場，炼鋼时又抽調了一部分人。这对第四季度10、11两个月生产指标的完成就有了一定的影响。社員群众为了实现炼鋼不誤生产的保証，紛紛研究办法，很多人貼出大字报，要求把19班增加为20班，领导同意后，群众就把增加的一班叫做“跃进班”，坚决不要工資。在群众加强了当家做主的責任感、發揮了冲天干劲以后，終于超額完成了全年生产指标的101.8%。

(三) 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偉大的整风运动，使新安棉織社的社員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一步，因而合作社获得了

进一步的巩固。这个社自 1951 年 12 月成立以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国家和上级社的大力扶植，在组织规模上、生产上逐年都有发展。人数从组社初期的 54 人发展到 289 人。这些人的生产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过去他们只能织一般的所谓“野鸡布”，现在可以织条府绸、灯芯绒、帆布、浴巾等 11 个品种的产品，有些还是供应出口销售的高级产品。1958 年生产总值较组社的第二年即 1952 年增长 95.5%，平均每年增长 13.6%；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 10.3%；供销上都已纳入国家计划，基本上消灭了淡旺季忙闲不均的现象。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社的积累也逐年扩大，至 1958 年转厂以前，已自有资金 20 余万元，购置了 70 余间厂房，占地 3,700 平方公尺。生产设备方面，集体公有电力机 89 台、手工木机 10 台和电力马达 24 台、马力 66 匹。此外自己还装备了一个翻砂工场，自己翻砂、制模、造机器配件，这样就基本上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生产发展、公共积累扩大的同时，社员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相应的提高。该社 1958 年每人平均年工资 686 元，较组社的次年即 1952 年 550 元增长 25%，如果与组社以前或组社头一年的情况比较，提高的比例就更大了。合作社还建立了疾病医疗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不少人过去在个体户捞鱼摸虾时所染上的血吸虫病，入社后都医治好了。有些人入社以后就结了婚。45 岁以下的社员大都摘下了文盲“帽子”，有些社员还上了业余中学。组社前小生产者受剥削、受鄙视、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合作社的社员对于这些并不满足。经过整风运动，

他們的社会主义覺悟大大提高，眼界更为開闊。为了进一步發揮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設的作用，他們提出了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要求。

八年来的實踐过程中，合作社虽在供銷上納入了国家計劃，保證了生产的不断发展，但由于集体所有制的性質，以致在統一調配人力、物力、財力方面，在合作社收益分配方面，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影响了生产潜力的充分發揮。

由于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它的財產不便由国家作統一安排，也不便于合作社之間的相互調剂。如該社1953年間购进的电力機車48台，閑放在倉庫达两年之久。几年来任务分配不一，劳动組織經常調整，时而三班时而二班，設備利用不足，部分設備停而不用。1956年和1957年間，劳动力經常过剩約近30人，以致織布工做了搖紗工，技术力量未能充分發揮。再如該社如果增加一道染色工序，就能全能生产，但由于社社之間合并不易，久延未决。如果生产量較大时，只有四出加工，不仅增加生产費用，有时也使正常生产受到影响。

又由于合作社的利潤分配，按規定大部分全由合作社自行支配，既不止繳于国家又不能在各合作社之間統一調剂，以致处理国家、合作社、社員三者的关系上，多从小集体的利益出发，社員的經濟主义思想，也就不容易完全克服。如該社处理家屬入社問題上，有些社員就認為合作社发展了，积累也增加了，合作社即应“包下来”。又如他們在制定福利办法时，規定按人口補助，大人每月8元，小人每月7元，超过一般社会救济很多。社干認為，“只要有錢，用用也无妨”。这种情况，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員思想覺悟的提高，也影响到社会扩

大再生产的积累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的大跃进与社会需要的日益提高，合作社的生产关系已日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合作社的生产规模和发展速度，必须适应形势需要，因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已成为必然趋势。

上级社和区党委根据该社以上情况，于1958年5月下旬指示该社设立转厂筹备委员会，进行转厂筹备工作。筹备工作中，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帮助社员对转厂问题树立正确的认识，并以转厂为动力，进一步推动生产的发展，“更上一层楼”。1958年6月4日，社员大会一致通过转厂计划，并向上级社提出十大保证。同年6月10日经上级批准，准予转厂。

合并转厂后的新气象、新成就

社员群众要求转厂的目的达到了，要求成为工人阶级的愿望实现了。他们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干劲很大，进一步发挥了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在转厂最初的日子里，他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试制了新的花色品种26种，翻改了11种。他们打破了对机械化的神秘观点，用“土办法”创造了许多土机器，节约了劳动力，节省了劳动时间和原材料，也就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该社转厂以后的6个月，即1958年下半年，生产产值比上半年增加22%，劳动生产率提高8.1%，积累增长111%。与1957年同期比较，产值提高41.3%，劳动生产率提高25.1%，积累增加90.9%。

新安棉織社轉为地方国营工厂以后，在国家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原则下，社的设备资金、技术力量和劳动力等直接纳入国家计划，打破了原有按经济类型分管的局限性，有计划地进行了经济改组。1958年10月，在上级统一规划下，已将长宁区第一漂染社并入该厂，因而在有关工序上得到更好的配合，生产环节紧密衔接，运输时间减少，费用开支也节约了。1959年初，紡管局将该厂毛巾机10台调拨到毛巾被单公司，以便该厂专门从事棉布織造，专业生产。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这个厂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1959年是继续大跃进的一年，新安棉織厂全年产量计划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长15.05%。从1959年1—3季度计划执行情况与1958年同期比较来看，已经提高了18.34%。由于全厂职工继续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9年每台布机又由1958年的200梭增加到了225梭，每人看车台数由4台增加到8台，紵子车由单层改为双层，搖紗工看錠数由40增加到80甚至100。目前，全厂正在为提前18至20天完成1959年的计划而奋斗。

南陽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是 怎样过渡为国营工厂的

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就是地方国营星火机械厂的前身，这个生产机器零件的生产合作社怎么会一跃成为一家国营的机械制造厂呢？說起来有一段不平凡的过程。

1954年以前，分散在蓬萊区大林路、大兴街一带有七家生产五金零件的手工业戶。他們各自拥挤在不滿20平方尺的小木房中，使用着非常簡陋的生产工具：7戶一共只有4台陈旧的皮带車床，1台旧鉋床，1台小型台鉗；产品只是一些簡單零星的五金零件，有1戶生产紡織机上的“跳字表”就算是比較象样的产品了，其余几戶有的做些襪机零件，有的开开塑胶模子，有的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生活。

这7家手工业戶、36个人(其中学徒有21人)，同属区税务局組織的一个納稅互助組，彼此行业相同，地段相近，1954年9月开始組織成立南阳机器零件供銷生产合作社，到現在五年多的時間內，由于党的領導和国家的大力扶助，已經完成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经历了从分散生产到集中生产、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生产的发展过程。現在已經发展成为一家拥有348个职工、专为装配輕工业制造各种机械(如造紙机、榨油机等)設備的中型机械制造工厂——地方

国营星火机械厂了。正如当时7户中一个叫湯根元的感慨万分地说：“过去与现在，真是天壤之别！”

解放前后的处境

一提起过去，很自然地引起他们一段惨痛的回忆：解放前，在那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里，个体手工业者受着重重剥削，不要说生产不能发展，一家大小的生活也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七户之一的繆同庆，兄弟二人带了两个学徒，开一爿铁匠铺。这是一个很苦的行业，千百年来人们便有这样的谚语：“世间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这还仅是指生产上的劳累而言，其实何止于此。繆同庆的铁匠铺是靠大厂过日子的，旧社会里不会巴结拍马，便很难接到业务，就是接到业务也经常受大厂资本家的剥削。资本家对手工业者的剥削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事前压价，明明市场上2角1只的机械零件，他会一下子压到1角5分；另一种是事后杀价，结价时做了200元活，资本家会板着脸孔只给你150元。那时这些手工业者为了生活，只好忍受他们的欺凌。在那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跳的日子里，景况更加悲惨。有一次，繆同庆为一家工厂做了价值10担米的活，等到月底去结账时，算算钞票，只合一担多米。他很沉痛地说：“那时，我们是：做做气煞，不做饿煞。”就这样，这家铁匠铺到解放前夕已经濒于破产的边缘，有了买“户口米”的钱，没有买菜、付自来水的钱，他的两个学徒曾不得不拎了篮子到菜场去捡些菜皮来维持生计。这是7家手工业户的一个缩影。

全国解放，党把广大手工业者从苦难中救了出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给落后的手工业带来了生机。这七家手工业户的生产同样获得了好转。但是由于小手工业生产终究是个体的私有经济，这种个体的、私有的所有制，便是手工业生产分散、落后、盲目、保守的根源。他们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人少力薄，本小腿短，盲目性很大，这些根本的弱点，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克服生产上和销售上的困难，不能避免工商业资本家的控制和剥削，而手工业者本身生活不安定的状态也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王乾生也是七户中的一户，生产织布机上的“跳字表”，当时由于本市针、棉织业的迅速发展，生产日趋稳定，但是他也有一本“苦经”。他只有一台破旧的四尺半皮带车床，生产中必需的木模、翻砂、打铁、刨床、铣床、冲床、电镀等工序都得仰求别人，没有固定的协作对象，有时甚至要等人家夜间机器空闲时才能借用。人手又少，无论生产、经营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白天要兜揽业务，张罗资金，晚上生产，只要一个环节调度不上，不是延期罚款、质次退货，便是资金接不上而开不出伙食。有时虽然可以跑到业务，但由于本钱少，周转不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业务给别人接去。有时生产上只需用几钱几分的合金材料，由于不够起购点，不能买到材料；如果照起购点去买，因为本钱少又买不起。为了维持生产，只好各处奔跑，东借西讨，凑合凑来。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提高质量。当时织布厂要他每月生产几百只“跳字表”，而他无论如何也跟不上去，充其量只能满足十分之一。

合作化的光明大道

如何根本改变这种现状呢？党为手工业者指出了一条道路，那就是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条道路虽然是陌生的，但是当他們遇到延續不断的供銷困难而自己难以克服时，当他們亲眼看到和他們产銷协作关系密切的群力针織生产合作社组织起来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时，组织合作社便成为这7戶的共同愿望了。在党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光輝指引下，他們于1954年9月組織成立了南阳机器零件供銷生产合作社。

合作化以后，人力統一使用，力量增大了，原来的雇佣关系、师徒关系改变为互助合作的关系，人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資金和机器設備虽然仍是不多，但可以統一調度發揮較大的作用了。在建社初期，国家又給予減免稅款和銀行低利貸款的优待。从个体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很快地体现了它的优越性，初步克服了单干时所不能解决的困难，使生产成倍地增长。仅以“跳字表”为例，由月产四、五十只很快提高到一百余只；价格也由每只53元逐步下降到33元。特别值得一提的，这个称为制造“零件”的合作社，不到几个月，居然也能生产成套的襪机了。

尽管如此，由于建社初期受到房屋与資金的限制，生产仍然只能分六处进行，这样，生产一件成品，便有很多不便，造成不少不必要的浪費。比如打一只眼子，要由大兴街跑到斜桥，而淬火又要跑到丽园路，这就阻碍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1956

年全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出现，推动该社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一年，在上级社的扶助下，该社就从分散生产走上集中生产，变低级形式的供销生产合作社为统一盈亏、财产为社员集体公有的高级形式的生产合作社。同时，上级社又决定把 101 户从事五金零件的手工业户、215 人加入该社，并调拨 165,000 元贷款作为该社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之用，这就为迅速发展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合作社时期的三年中，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全体社员的努力，贯彻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方针，到 1957 年底已经积累了资金 192,600 元。产品从原来的机器零件逐步生产成批的喷粉器、手摇台钻、万用钳、绕线车、排线车等小型五金机件。至此，这个社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中型的五金工厂的规模。

对资本主义逆流的斗争

在合作化的道路上，他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合作社组织起来以后，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虽然起了根本变化，但是个体手工业者曾经长期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因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入社后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开放时，由于社里没有加强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因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便在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内开始抬头滋长，一部分社员闹退社走回头路，偷偷摸摸地搞“地下工厂”；或者“骑两头马”，一部分小业主利用旧的师徒关系、雇佣关系，拉拢了一批认识不清的社员一齐从事资本主

义经营活动,最多时竟有 93 人,约占全社总人数的 40%。而且,这种活动越来越公开化,有些社员竟彻夜为“地下工厂”生产,白天把保健站当“休息站”,每天有 30 多人去“看病”;甚至把私人承接的货物拿到社里来做。还有人居然明目张胆地在车间门口贴上“行政干部一律不准进车间”的纸条。车间里几十台机床,只有一部分思想坚定的社员在继续生产,月度生产计划最差时只能完成 30—40%。在这股逆流的冲击下,合作社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坏了;起初感到流动资金不足,以后出现了没有钱发工资、没有钱买原料的现象。就这样,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但是,开“地下工厂”、投机倒把、违法乱纪、梦想个人发财致富的,毕竟是少数几个不法小业主和富裕的独立劳动者,大多数人是在花言巧语、小恩小惠下被他们拉去的。这股逆流,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很快给制止了。在党委的领导下,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开展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通过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个人与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进行“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道路是否走得通”的群众性辩论,不但清除了个别盗窃合作社财产、严重破坏国家经济的小业主,维护了合作社的集体利益,更重要的是使全体社员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界线,端正了政治方向,认清了“资本主义死路一条”的道理,坚定了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

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过渡为全民所有制的轻工业机械制造工厂，是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也是这个合作社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各个方面迅速出现了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局面。根据统一规划，领导上向南阳社提出了担负起支援轻工业和手工业技术改造的新任务，要求他们在生产小型五金工具的基础上制造切削机床。为了完成新的光荣的任务，首先必须打破原有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小圈子，因为合作社的财产是全体社员集体所有，这就一方面在财力、人力和技术力量上限制了该社根据国家需要进一步扩建的可能性，同时，继续保持合作社集体所有制，也使得社员局限在社的集体利益的范围内，在业务上贪图利润多而只愿承接大活，对于试制新产品、改善业务的积极性就受到一定限制，不能充分发挥现有技术设备的潜在力量。这些情况，已经表明了集体所有制形式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社干和社员们通过全民整风运动，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这时，党委和上级社就掌握这个有利时机，引导社员充分酝酿讨论，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于1958年4月将南阳社转为上海市五金合作社联合社直接经营的合作工厂，继之在同年10月2日又转为现在的地方国营星火机械厂。

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的转厂过渡，又一次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转厂后，他们不仅在供产销方面进一步纳入

了国家计划轨道，而且根据国家的规划，统筹调剂了厂房设备、技术力量和资金，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年来国家仅在厂房方面，就调配了2,300平方公尺的面积供该厂扩建之用，同时又拨了必要的机器设备，如一丈二尺的龙门刨床、20寸牛头刨床等。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在转厂后的一年中，发挥了比集体所有制更大的优越性，生产得到迅速发展。1958年生产总值比1957年增加将近两倍，为国家制造出大批的切削机床和各种轻工业的专用设备，还上缴国家利润达70余万元，超过了转厂以来国家投资13万元的四倍以上。

自己武装自己

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南阳机器零件生产合作社转成为合作工厂，再过渡为地方国营工厂，新的生产关系迅速推动了生产力向前发展。从技术设备方面来看，合作化以后，虽然由上级社调拨了从大工厂里替换下来的80台机床，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但是当时的设备还很不齐全，正如社员们说：“搪缺搪床，磨缺磨床，刨又没有刨床，锻件只有用手工打！”而技术力量则更差了，有的工人连齿轮车床是个啥样子都还没有见到过。但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社员们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由于社员们在过去长年累月的手工生产中，积累了不少实际的经验，同时有着渴望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强烈愿望，因而对技术革命的要求更为迫切，在技术革命运动

中个个发挥了无窮的智慧和冲天的干劲。

技术革命运动是从解决技术设备问题开始的。既然需要完成上级分配制造精密齿輪車床的任务，就得解决一系列的技术设备问题，如十二尺以上大車床、龙门鉋床、磨床、精密的全齿輪車床等，这些都是生产过程中所必需而却是他们缺少的。面对这些困难，怎么办呢？伸手向上面要，上面没有，即使有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徒然推迟了制造車床的时间。于是他们就下定决心自力更生，针对当时生产齿輪車床技术设备上的问题，发动全厂职工提建议、献妙计、攻关键，1958年内便实现了群众提出的技术革新建议300多项，1959年1—9月又实现了107项，其中重大的项目就有23项，他们以“蚂蚁啃骨头”的办法自己制造了18尺、12尺龙门鉋床三台和10尺以上大車床二台，自行设计和制造了土导轨磨床、土大拖板磨床、土牛头車床、土搪床、电动夹板鉋头和电动鉋头等各种土、洋机床53台，自己武装了自己，更换了原来大工厂调拨来的大批旧机床，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们制造的这些土、洋设备，由于效率高、质量好、花钱少，在同行业、工种间，还进行了推广，如土导轨磨床、土搪床等，曾在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的技术墙报上予以介绍，其中大拖板磨床还在科技协会召开的钳工机械化会议上作了专门介绍。在工艺操作上，他们也大胆采取了新技术，实现了旋风切削、高速切削、多刀切削，推行了钳工机械化、装配葫芦化、毛头电气化。这样，就完全改变了原来生产的落后面貌，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随着技术设备关键的逐个解决，第一台8尺齿輪車床終

于在1958年8月开始制造出来了。到1959年9月，一年零一个月中，先后制造了3.5—8尺的齿輪車床358台，还生产了輕工业造紙、食品、鐘表、光学等机械設備98台。在大鬧技术革命的过程中，技术队伍也迅速地成长了起来，該厂現有各种机床的技术工人175人，其中五級工以上的就有23人。原来在个体生产时只管跑跑业务記記賬，在1956年进社时对机器“一窍不通”的何士祥，今天都已成为車床上的一位能手，不但能車一般的机械部件，而且还能車齿輪車床內的精密度要求很高的齿輪。

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全社职工在合作社共同劳动中，逐步培养起当家作主、以社为家的集体主义思想。經過1957年在社內开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实际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的鍛炼，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教育和鼓舞，社員群众批判了小生产者自私、落后、保守等思想，树立起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忘我劳动精神。社員張惠方解放前是一个串街游巷的流动手工业者。就是这个在旧社会里被人看不起的人，在大跃进中和十多位同志一起苦战了四昼夜，攻破了八个重大的技术关，終于試制成了該厂第一台8尺齿輪車床。在試制过程中，他廢寝忘食，病倒了仍坚持上工，当領導上发现再三劝他回家休息时，他說：“人在床上，心在車床，反而难过，还是让我参加突击，完成任务好放心。”这是何等动人的事例！方月生同志是打铁出身的，过去

被鄙視為“黑鐵鬼”，為了解決該廠鑄件跟不上生產需要的問題，他在黨的領導下，組織了 14 位同志，日夜奮戰，克服一切困難，終於白手起家地搞出了一個翻砂車間。在緊張的勞動中，他被鐵水灼傷了，還堅持不肯下火綫。在大躍進的日子里，象這樣的事例，星火機械廠里何止一二！就連在 1957 年因一時糊塗搞過“地下工廠”、走過“回頭路”的社員，在黨的總路綫的教育和大躍進的鼓舞下，也完全變了樣。張士宏在 1957 年曾經與人合伙搞過“地下工廠”，妄想從中撈一票，白天在社內磨洋工，晚上拚命為自己生產。在 1958 年大躍進中，他也受到了鼓舞和教育，在技術革命運動中，他不僅為了如期完成國家計劃創造了一夜裝配三台機床的新紀錄，而且還積極提出製造土磨床的合理化建議，解決了該社磨車床平面的技術關鍵問題。

在 1959 年繼續大躍進的形勢下，該廠全體職工更加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無論是老師傅還是藝徒，老年工人還是青工，為了超額完成國家計劃，都投入了熱火朝天的紅旗競賽運動，發揚了“競賽是對手，協作是朋友”的共產主義風格，出現了你追我趕、學先進趕先進的躍進局面。藝徒顧愛仙、許慧芬相互競賽，將生產鎖接頭的指標從 12 只刷新到 120 只。連 60 歲的老年工人吳福堂，也在加工主軸螺絲生產中，一個人做到兩個人的活。因此，全廠平均達到了一個人做兩個半人活的生產水平。先進小組、先進人物不斷涌現，1959 年 1—7 月，就涌現出了集體先進紅旗工段和小組 10 個，紅旗手 32 名，約占全廠職工的 30% 左右。由於職工們發揮了高度的生產積極性，出色地全面超額地完成了國家計劃，1959 年 1—9 月的產

值比 1958 年同期增加 276%，車床成本降低 12%，利潤增加三倍，獲得了全國和上海市“群英會” 1959 年先進基層單位的紅旗。

生產迅速發展，生活共同提高

南陽機器零件生產合作社由於生產關係的變革、技術設備的更新和技術隊伍的壯大，生產力獲得了飛躍發展。1958 年的生產總值是 2,016,000 元，比 1955 年的 82,812 元增長 24 倍，1959 年預計將達到 500 萬元，比 1958 年繼續增長到 2.5 倍。1958 年平均每個工人生產值達到 6,952 元，比 1955 年 2,509 元增加近兩倍，1959 年預計達到 14,000 元，還要比 1958 年繼續提高兩倍。1958 年積累資金 339,852 元，比 1955 年的 16,698 元增加 19 倍，1959 年將達到 90 萬元，將比 1958 年繼續增長 2.6 倍。

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職工的物質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現在平均工資要比入社前的勞動收入提高 30% 以上。轉廠以後，他們享受了勞保待遇。1958 年有 78% 的職工學文化，1959 年又增加到 92%，而且 90% 以上的工人已具有了高小以上的文化水平。在黨的領導下，他們正共同為更加幸福的明天繼續努力。

徐行草織品供銷生产合作社的 建立与发展

上海市嘉定县徐行草織供銷生产合作社建立于1952年初。在1958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已轉为徐行人民公社的草織工艺厂。

供銷生产合作社是通过供应原料、推銷成品，把分散經營的手工业劳动者串連起来的合作化的一种低級形式。尽管如此，这个供銷生产社在建社后的七年中，仍然十分明显地体现了“組織起来”的优越性；它們在統一供銷的过程中，不仅減除了中間剝削、摆脱了自由市場，基本上克服了生产上的盲目性和季节性，并且通过供銷，促使社員改进了生产技术、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了社員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供銷生产合作社直接轉变为人民公社的工厂，是1958年大跃进形势推动下农村手工业合作社发展的必然結果。

徐行草織供銷生产合作社在轉厂以前，即1958年底，共有社員1,797戶，生产人員約4,490人，連同有供銷联系者，共有生产人員2万多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兼营副业的农民；自有資金15万元，合作社职工46人，厂房倉庫合約950平方呎。主要产品是以黄草、水草、麦边編結的日用手工艺品，如

提包、拖鞋、杯套、盆垫、果盒、玩具等，約 300 余种。其中黄草是本地种植的，水草、麦边原料来自河北、山东、广东，目前以黄草原料为主。徐行的草織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一种“經濟、美觀、实用”的民間手工艺品，不仅行銷全国，并且在国际市場上有一定声誉。

草織品的由来

黄草原是野生的草本植物，数百年前，徐行农民发现它具有光滑、柔軟、坚韧等特点，最初就利用这种草茎搓成繩索或編成鞞鞋（一种平底的草鞋）、凉鞋。随着需用日多，黄草就从野生变成由农民栽培。每年清明前后播种，立夏前后插秧，立秋前收割。据光緒庚辰年（1880 年）嘉定县志重修本的記載：“黄草，种于水田，收成时宜干攤，产东北乡，城东三里有蒲鞞村，村民以黄草織凉鞞，更有制为凉鞞（同鞞）者。”又載：“蒲鞞市向聚新涇鎮，同治以来移于徐家行。”可見近百年以前，徐行的黄草編織已相当发达了。

黄草織品起初只銷江浙、苏杭一带，以蒲鞋为主，清朝时代，当地官吏曾以此作为“貢品”。后来产品銷路渐广，并由广州轉銷南洋等地，受到国外华侨的欢迎。

1920 年左右，无孔不入的帝国主义洋行买办，看到黄草織品价廉物美，胜过暢銷欧美的日本草制品，就开始成批收购，由上海出口。花色品种經草織艺人精心研究与琢磨，也有了进一步改进和发展，除了鞋子外，增加了提包、盆垫、杯套、玩具等数十种。据統計 1925 年出口价值占总产值的 30%，

以后出口数量逐年增长。1936—1937年几乎全部供应出口，出口年产值达40万美元。全部产品销往美洲的占60%，南洋占20%，西欧占10%，内销只占10%。产区由原来的澄桥、徐行一带，扩大到东至罗店、南到戩浜、西到娄塘、北到太仓浏河周围35公里的一带地区。从事生产的农民约一万余人。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草织品出口数量下降，生产人员减少为5,000人左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出口有所恢复，产销亦逐渐活跃。

解放前黄草编织者的悲惨境遇

黄草织品是劳动人民的精心制作，但是勤劳智慧的黄草编织者虽然双手做出了精美的产品，却并没有摆脱贫穷的厄运，他们的命运被紧紧掌握在那些大腹便便的洋行买办和层层剥削的中间商人的手中。自草织品有史以来，销售就是通过中间商人进行的，商业资本家利用手工业者“本小腿短”的弱点，在供销方面紧紧卡住小生产者的脖子，进行残酷的剥削。开始时，他们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刺激编织者大量生产，然后猛地压缩收购数量，使生产者不得不贱价出售。他们掌握手工业季节性生产的特点，在天雨产量多的时候收购价格就杀得更厉害。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更以囤积的大米来换取廉价的产品。“清明七月半，拖鞋嚼(贱)一半”，“货色一要肯磕头，三日落雨象杀头！”这两句流行的俗语，充分反映出在商业资本剥削下手工业者命运任人摆布的惨相。据说，1935年收价最贱时，三只黄草提包只换到四两豆油，五双拖鞋只换

到一斤大米。这和现在一只黄草提包一斤半豆油、一双拖鞋一斤半大米的情况比较起来，自然相差十分悬殊了。

当地几首流行的民歌，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前黄草编织者所处的悲境：

撥因勿撥蒲鞋村，^①

蒲鞋村里磨黄昏；

黎星直南还未咽，

晓星未上催起身。

千做万做蒲鞋村，

蒲鞋一捆又一捆；

开花棉袄常伴身，

十二月卅人急昏。

做捆蒲鞋实在难，

清明时节落雨来；

蒲鞋老板发横财，

糴米不够买糠菜。

从“买进来”的合作社到“卖出去”的合作社

解放后，黄草编织者见到了太阳，“糴米不够买糠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由于在旧社会长期受剥削，他们的生

^① “蒲鞋”是草织品的统称。“撥因”即嫁女儿。

活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因而在解放初期不得不以較多的时间和劳动力从事草織品生产，借以克服当时較为严重的春荒，作为生产自救的主要出路。那时，黄草編織者还是一家一戶分散生产，当然談不上計划性，产量一多，銷路便发生問題。这时，唯利是图的商业資本家看到油水不大，竟然按兵不动，不顧当时編織者迫切需要解决草織品銷路的困难。党和政府为了帮助他們解决困难，于1950年春在当地的供銷合作社中設立了一个收购草織品的部門。但是，供銷社的主要任务是供应农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推銷主要农产品，他們对于草織品的經營和生产組織工作远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群众向政府反映說：“我們已經办起了‘买进来的合作社’（指供銷合作社供应日用必需品），減除了中間商人的剝削，为什么不再办一个‘卖出去的合作社’呢（指推銷草織品的合作社）？”群众在生产上希望組織起来克服困难的要求自发地提出来了。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迫切要求，1952年春，在上級社的领导下，开始发展社員，湊集股金，成立了以黄草編織者为对象的徐行草織供銷生产合作社。社員以戶入股，农忙下地，农闲編織，分散生产，統一經營。

黄草編織者对于供銷生产合作社的組織，是积极拥护的，有些人經濟比較困难，入社时把家里仅有的老母鸡和鸡蛋出售了交納股金。社員陈江氏拿到股金收据后激动地說：“做了五十年蒲鞋受了五十年的气。参加了自己的合作社，永世不再受私商的气了。”当时仅在三个月中就有500多戶入股，湊集股金1,000多元。

供銷生产合作社发展得很快，反映了群众要求組織起来

的愿望。可是，社成立不久，立即遇到了困难，主要是他們既少經營經驗，又无足够資金，1,000元股金用作三天的收购款还不够。特别是合作社如何保証有一定的收购量，使社員能維持正常生产，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問題。合作社的这些困难很快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他們在上級社的帮助下，和嘉定土产公司建立了代购关系，1952年全年代购总额达7万元。一年，合作化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了，他們不仅推銷了社員产品，稳定了市場价格，同时还減除了中間剝削，增加了社員收入。如社員吳丕林算了一笔帳，1952年由合作社收购提包150套，增加收入30多元，过去年年借債，現在吃、着都齐备了。一年来供銷生产合作社也初步摸索到了一些草織品經營管理的經驗，为进一步巩固提高打下了基础。

但是从經營方式来看，当时代购业务的缺点是：代购費用較少，不能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其次，由于代公司收购，不能切实地掌握淡旺季的产銷規律，产銷环节不能密切銜接，难以达到有計劃发展生产的目的。

这个情况說明：一个以供应原料推銷成品为主要任务的供銷生产合作社，在初建阶段当自己力量还不能单独經營的情况下，采取代国营公司收购的形式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合作社的經濟条件逐步具备后，直接掌握供銷业务的环节，由代銷改为自銷，那就更能發揮組織生产、推动生产的作用了。

1953年起，供銷生产合作社逐步开始了草織品产銷的自營業务。一开始，他們由于沒有切实掌握草織品“旺产淡銷、旺銷淡产”的規律，在旺产季节，合作社不得不把大于自有資金10倍的貸款全部积压在成品上，以致一度弄得連行政人員

的工資都發不出。他們怎麼會弄到這種地步呢？是草織品沒有人要嗎？不是的，關鍵是銷路沒有打開。“等客上門”的業務經營方式不能解決問題，必須大力組織草織品的推銷。由於黨和上級社的支持和該社主觀的努力，經過 1953 年努力的推銷工作，不僅打開了草織品的銷路，而且與各地很多國營企業和合作社建立了業務關係。新的產銷關係的建立，使合作社的發展有了可靠的物質基礎，也真正符合了群眾要求“賣出去”的目的。

為消費者着想就有出路

草織社產品銷路打開後，經濟情況逐漸好轉，1953 年盈餘 4,200 元，扭轉了虧本現象；1954 年社員發展到 1,386 戶、3,250 人。這時，合作社的領導及部分社員產生了自滿情緒，手工業者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開始滋長。社的領導看到產品銷不出去的難關不但已經解決，而且还出現了供不應求的現象，就自滿地說：“合作社辦得不錯，腳跟站定了！”合作社和社員為了多產多銷，不再注意產品質量；為了完成交貨計劃，有時還降低驗貨標準，以次充好。有的產品利潤高達 50%。檢驗員說：“合作社牌子老，質量標準低一點照樣有人要。”社主任還得意地說：“大伏天的扇子，貨賣當時。”部分社員看到驗貨員眼開眼閉，馬馬虎虎看一下，也就乘機偷工減料，次品率一度高達 30%。這樣，很快出現了部分客戶拒絕執行合同和退貨的現象，合作社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黨委和上級社看到合作社這樣下去有垮台的危險，必須

加以糾正，于是針對草織社存在的問題，在1954年上半年，發動群眾開展了一次以改善經營作風和提高產品質量為中心的整社運動。當時，發動群眾進行了三查（查質量、查浪費、查制度）、算帳（算因質量低劣，國家、合作社及社員受到的損失帳），使群眾認識到合作社面臨的嚴重危機，從而樹立了“質量第一”的思想。同時，合作社的領導幹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也大量地暴露了經營上形形色色的資本主義經營思想和作風，認識了它的危害性，並提出了改進的措施。

通過這次整社，合作社從上到下提高了思想認識，認清了正確發展的方向，因而生產上經營管理上獲得很快的发展，產品質量大大提高，如拖鞋副品率由25%降低到5%，管理制度上的混亂現象也很快克服，消滅了差錯，加強了成本核算，個別利潤高的商品還進行了調整價格。這樣，草織品在市場上的信譽也就逐漸恢復。

1954年的整社運動，給合作社帶來了新氣象，草織品的質量和花色品種有了顯著的提高和改進。但是，與國外消費者不斷提高的要求相比，仍然不相適應。1955年在廣州召開的出口商品交易會上，南洋代表反映：草織品都是幾十年前的老式樣。事實也是這樣，年來黃草織品偏重於質量的提高，却忽視了式樣的改進，提包一類產品總是長方形的，盆墊也跳不出方、圓、長方的形狀。那次出口商品交易會上，只成交提包500套，沒有達到預定的計劃。國內消費者也反映黃草織品式樣花色太少，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滯銷現象。

這時，如何增加草織品的品種和改進式樣，已成為產銷上的主要關鍵。合作社緊緊抓住這個問題，開動腦筋。他們除

了經常向土產出口公司了解國外消費者對草織品式樣改進的意見外，自己也主動和國內各經營單位建立了“顧客意見卡”的通信關係。隨後，又將熟悉業務的社干和技術高的社員10多人組成生產技術研究小組，負責試制新產品。樣品出來後，就在社員代表大會上展出，由代表串連全體社員，掀起一個群眾性的花色品種改革運動。這樣，新品種數以百計地做出來了。經過反復不斷地改進，草拖鞋出現了尖頭、空頭涼鞋等式樣，並新設計了花瓶套、字紙簍、麵包籃等幾十種新產品，各種提包也跳出了長方形的範圍，編成圓底六角、圓形、元寶形、圓底蚌形、腰圓形等新式樣。1955年底，品種數量比1954年的94種提高了2.5倍。這些新產品受到國外市場的歡迎，據1955年底統計，完成出口總值27萬元中，80%屬於新產品。經過一系列的改進，草織品的確出現了一種新面貌，這樣不但使合作社生產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銷售市場日益廣闊，更有意義的是增加了外匯收入，有力地支援了國家經濟建設。

人們對於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是隨着生產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同時，人們要求產品多種多樣以滿足需要，因此，必須不斷地改進產品的花色品種，忽視了這一點，供銷生產社就無法從供銷著手起指導生產的作用。以黃草麥邊為主要原料的草織品，百年來就是“本色”（淡黃色）一種。能不能把草織品漂白後再染上其他顏色呢？消費者向他們提出了一個新問題。但是事實上，在有些消費者手里早已出現了漂得雪白的產品。看來這一關是非過不可了。於是他們克服了保守思想和畏難情緒，向先進地區學習，經過半个月反復試驗，終於摸索到配料比重、操作規程等經驗，在1956年3月初試驗成功，把草織

品染上紅、綠、藍等顏色，产品銷路因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丰硕的果实

徐行草織供銷生产合作社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年来的努力，通过供銷业务的经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改善了社員群众的生活。下面一系列的数字，充分说明了合作社的成就是巨大的，从而証实了合作化道路的胜利。

首先，合作社在供銷业务上发挥了巨大的組織作用，为草織品打开了銷路，支持了生产。解放以来，黄草織品不仅与国内各大城市建立了产銷关系，銷路日益增加，而且外銷方面也蒸蒸日上，据統計，1957年远銷苏联、捷克、英国、澳大利亚等27个国家。现将解放后九年中該社草織品銷售数量逐年增加的情况列表如下：

	銷售总額(千元)	其中：出口(千元)	出口占銷售总額%
1949年	110	20	18.2
1950年	130	50	38.4
1951年	130	60	46.2
1952年	242	60	24.8
1953年	324	130	40.1
1954年	452	182	40.2
1955年	456	266	58.3
1956年	667	207	31.0
1957年	1,016	349	34.3

其次，合作社在发展供銷業務的過程中，和私商的不法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有效地限制了商業資本家對農民的剝削。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以前，合作社在領導草織品市場、穩定價格、減除中間剝削、保障社員收入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自合作社建立以後到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以前這一段時間里，合作社和私商在草織品推銷業務上的變化情況如下：

	銷售總額 (千元)			合作社占銷售總額 %
	合計	合作社	私商	
1952年	242	36	206	14.88
1953年	324	91	233	28.09
1954年	451	278	173	61.70
1955年	456	324	132	71.60

再次，草織品銷路打開了，草織品的生產步步上升。從產地看，除了徐行、華亭、婁塘三個地區以外，嘉定縣內其他鄉鎮也普遍推廣，從事草織品編織的人數增至2萬餘人。從產值上看，1957年已達108.7萬元，超過了歷史上產值最高的一年即1936年。九年中，草織品產值逐年發展情況如下：

	總產值(千元)	定 比	總產量(千件)	定 比
1949年	115	100	646	100
1950年	140	121	785	121
1951年	130	113	731	113
1952年	246	214	1,382	213
1953年	348	303	1,955	302
1954年	483	420	2,711	419
1955年	475	413	2,669	417
1956年	824	716	4,706	728
1957年	1,087	945	6,136	949

黃草織品產銷兩旺，使他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1957年全年度四個月農閒時間計算，每人每月平均收入25元，比1952年提高一倍以上。過去一部分社員認為編織草品沒出息，曾經想到城里做工，現在也安心了。小廟鄉的社員說：“黃草原料勿象樣，世界浪向有名氣。”他們已認識到，草織品能夠出口換取外匯，做蒲鞋象煉鋼一樣可以支援國家建設。社員生活安定以後，便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新產品的設計和製造。如草織能手李日琴在草品上精心編織了“和平鴿”的圖案，得到國外的好評，1956年被選為出席全國手工藝人會議的代表。社員們對於自己的職業有了光榮感，對工作也就更加熱愛了。

由小集體到大集體

1958年，全國範圍內一個波瀾壯闊的國民經濟大躍進局面出現了。為了大大發揮農業生產的潛力，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組織了工農商學兵相結合、農林牧副漁綜合發展的人民公社。農業生產上的大躍進，對於勞動力的需要極為迫切。原來以副業生產為主的草織品供銷社，出現了與農業生產的新矛盾，主要是從事副業的勞動力無法保證，草織品生產數量顯著減少。1958年該社草織品共產4,210,000件，比1957年6,135,900件減少了31.4%。產量的減少又與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發生了矛盾，這些矛盾是必須解決的。農村公社化以後，為了實現多種經營，增加收入，副業生產是需要大力發展的。問題關鍵是對於整個勞動力怎樣進行統一安排。這個問

題說明，以副业生产者为对象組織起来的供銷生产合作社，已經不能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須“更上一层楼”，积极改变原有的組織形式。1959年1月，徐行草織供銷生产合作社在当地党委統一領導和规划下，改組为草織工艺厂，受徐行人民公社領導。

草織供銷生产合作社发展成为公社的草織工艺厂，虽然在性質上仍屬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但已从原来仅仅通过供銷业务联系組織生产的組織形式，轉变为人民公社經營的工厂，变小集体为大集体，在公社的統一領導下，实行单独經濟核算，这样既能充分发挥他們生产經營的积极性，又能得到公社农、林、牧、副、漁的全面安排和发展，解决了以往农业和副业在劳动力安排方面的矛盾，并且加强了公社对草織品生产的組織領導。公社把草織品生产作为自己日常領導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經常加以領導和督促，并責成公社的工业部具体管理，各个生产队也都确定了一个主任(队长)管理草織品的生产。公社党委还根据草織品生产的特点，提出了专业生产和分散生产同时进行的发展方針。因为分散生产便于社員利用晚上、雨天、工前工后的時間，一方面照顧家务，一方面从事編織；生产队根据农事忙閑情况，分別安排一部分或大部分社員进行生产，充分发挥社員的生产潜力。同时，公社建立了一个生产工場，現已集中75个技术較熟練的专业生产人員，从事編結高級的精細的产品，并負責技术指导和經驗交流。目前，公社的生产資料实行三級所有制，而生产队一級所有制是基本的，因而許多生产队办起了集中性的生产工場，到目前为止，已有20个生产队、460个社員从事专业

編織。集中一部分社員专业生产后，可以在社員之間进行合理分工，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方向发展。目前該厂已在个别环节上把手工操作改变为半机械生产。如草拖鞋內衬的“托布”，用縫紉机操作后，生产效率提高两倍；又如用制帽机代替手工制新式的麦草籃，产量从原来每天6只左右提高到30只左右，这都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滿足国内外市場需要。

生产领导的加强和农业与副业矛盾的解决，大大促进了草織品生产的发展。1959年1—9月份的实际产值已达924,600元，比1958年同期590,500元的产值增加56%，估計1959年全年的产值可达128万元，比1958年增加83%。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内外市場的銷售数量也大大增加。1959年出口的产值預計可达776,000元，比1958年增加1.2倍。出口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也将从1958年的44%增加到1959年的近60%。供应国内市場的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供应北京、武汉、上海等地的各种草織品就有10万件，都是做工精細、新型美观、要求严格的精品，而且都是在第三季度中突击生产出来的。这一任务，如果没有改变原有供銷生产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如果不由公社統一领导，动员和調动全公社的編結力量从事生产，无论如何是无法完成任务的。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合作社改組为公社工业后的优越性。

黄草織品生产的大力发展，也增加了公社的收入和社員的收入。1959年1—9月份仅徐行公社草織工艺厂上繳給公社的利潤就达157,000元，增加了公社的公有資金，支援了公社发展生产。在同一时期內，社員的副业收入增加到55万元，

如以生产人员两万人平均计算，1959年9个月来，每人即可增加收入27元多，对改善社员的生活也起有一定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大跃进的热潮中，人们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人民公社的美好远景有力地吸引着人心，工作愈做愈有劲，思想越来越开朗。下面一首民歌，深刻地反映了今天草织社员们内心的喜悦，显示出了大跃进的时代风貌：

细细黄草一根茎，
织草姑娘有深心，
清早织到夜黄昏，
手里黄草变成金。

一把黄草软溜溜，
姑娘手里变花头，
织成提包细又巧，
白鸽双双飞上头。

嘉定徐行的黄草织品是本市郊区手工艺品的特产之一，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极其美好的发展前途。过去十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根据生产特点，先通过供销业务联系的形式组织起来，发展了生产，之后，又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进一步从供销生产合作社发展成为公社工业，使生产得到了飞跃的发展，社员生活日益得到改善，证实了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可以相信，今后在人民公社进一步发挥优越性的前提下，通过勤劳智慧的草织编结者的努力，草织品生产必然会出现更大的跃进。

星鋒竹器生产合作社 的发展过程

星鋒竹器生产合作社是目前上海手工业中仍旧保持集体所有制的許多单位中的一个。这个社主要生产家用竹器，产品品种很多，按大类分有細作、圓竹、短竹、蒸籠四种，具体品种不下 150 余种，有高到二丈以上的竹梯，也有几寸长数分闊的括浆刀，其他的日用竹制品如竹床、竹針、筷子、淘籬、洗帚、竹椅、竹櫈、书架等等，应有尽有，与人民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家用竹器是日用小商品，花色品种多，經濟实用，广大群众日常生活都很需要。竹器行业合作化以后，由于变个体生产为集体生产，不仅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更进一步发揚了生产上和銷售上固有的优良傳統，更好地适应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从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的发展

星鋒竹器生产合作社是在本市手工业实现全面合作化过程中組織起来，然后逐步从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发展的。1956年初，本市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声中，分散在沪西曹家渡一带的

从事竹器生产的个体手工业者，共有33户88人，組織起来实行了合作化。接着，按照产品类别分别成立了长宁区第二竹器生产小组和长宁区第三竹器供銷生产小组。前者是集中生产、統一盈亏的生产小组，后者是分散生产、戶計盈亏的供銷生产小组。当时，第二竹器生产小组主要的产品是蒸籠、扛籃、煤篩和淘籬等，这些产品除小部分需要和消費者直接見面外，其他大都是銷售給工厂企业，因此，除了原有三个門市部繼續生产并經營淘籬等小产品和承接居民修理业务外，其余均实行了集中生产，統一核算。第三竹器供銷生产小组的主要产品則是竹筷、馬桶甩洗、洗帚、竹櫈、竹椅等家用竹器。这些产品除門市銷售外，主要依靠自己沿街叫卖或是設摊推銷，为了保持这种便利群众的特点，当时就組成了分散生产、戶計盈亏的供銷生产小组。

任何工作的开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順的，就拿第二竹器生产小组來說吧，他們虽然一开始就实行了集中生产，但由于受到資金和生产場地的限制，出現了“吃飯上飯店，生产在露天”的現象。小组里沒有地方做飯，組員們只好上飯店买飯吃，有的人付出的飯錢就占去他工資收入的一半，家庭負擔重的人意見就多了；同时，許多成品和半成品摆在露天，日晒雨淋，常常霉烂变质，遭受損失。但是，这些摆在面前的困难，沒有使他們后退，生产小组的組員們决心用自己劳动的双手改变这种情况。他們經有关单位的协助，于1957年初在长宁路1250弄內找到了一块空地，社員們省吃儉用，努力生产，积累了一些資金，加上党和政府的扶持，终于在同年5月修建了10間房屋，开始有了自己的生产場地和寬敞清洁的食堂。他們亲

身体会到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是巨大的。第三竹器供銷生产小組也在同一时期內，逐步改变了各戶內部旧有的雇佣关系，并将生产“圓竹”的 15 戶、20 人集中生产，統一盈亏。至此，两个小組除剩下做“短竹”的 14 人仍分散生产外，已基本上集中生产。在 1958 年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有利形势推动下，为了适应生产迅速发展的需要，根据上級规划，两个小組合并成立了星鋒竹器生产合作社，目前共有社員 44 人，資金积累 4 万余元。

集体生产优于个体生产

星鋒竹器生产合作社从实现合作化以来还不滿 4 年，由于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各方面的成就是很显著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发展了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公共积累。竹器行业个体生产时，資金少，劳动生产率很低，組織起来后，由于打破了旧的生产关系，大大发挥了手工业社員的生产积极性。如社員陈連松过去在业主家做活时，尽管一天做到 15 个鐘头左右的工，也只能出一只 40 寸的大蒸籠，現在一天 8 小时的工作，却可以做两个多同样規格的大蒸籠。为什么呢？正如他說：“現在認識到做工是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該社 4 年来的年产值和劳动生产率以及資金积累的发展情况如下：

年 度	年 产 值 (元)	%	劳 动 生 产 率	%	资 金 积 累 (元)	%
1956年	69,577	100	790	100	7,717	100
1957年	104,741	150.53	1,190	150.63	12,303	159
1958年	101,105 ^①	145.31	2,297	290.75	22,963	297
1959年 (預計)	118,756	170.68	2,699	341.64	49,715	527

其次，便于在較大範圍內調配劳动力和安排生产，克服了淡季的威胁。家用竹器在历史上一年中一般有半年的“瘟档”，这时候，手工业者不是卷鋪盖回乡，就是在本市做流动工，有的做些小买卖糊口謀生，好的可以弄点“飯鈔”，差的往往連本蝕光。实现了合作化以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面貌。手工业的产品除了由上級收购和訂购一部分外，主要由于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克服了个体生产在資金上、技术上所不能解决的困难，不仅可以根据不同季节調換生产当令的竹制品，还可以承接工厂企业所需要的大批定貨，这样就把淡季变成了旺季，基本上做到了常年生产。

第三，可以更合理地利用原材料。集体生产以后，产品众多，可以对原材料进行綜合利用，物尽其用。如以一支毛竹为例，一般的竹头竹梢用处是較少的，但是在該社則成为宝貴的原料，如毛竹头可以用来做蒸籠底、毛巾架的垫；蒸籠底用

① 1958年产值的絕對数接近1957年水平，但生产人員由88人减少到44人，实际上产值增加近一倍。

剩的箴青、箴黃又可以做大小不同尺寸的飯墊或背籃；毛竹梢則是竹梯檔子最好的材料。總之是樣樣有用，沒有廢料。

第四，為實現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生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該社目前基本上還是手工操作，仍然是各人各做一件產品，但是對一些共同性的生產環節，如選料、鋸料等已經集中，指定專人負責，這樣不僅保證了原材料的合理利用，防止了大材小用、小材不用的現象，並促進了某些工序的機械化。

思想面貌的變化

手工業者參加合作社以後，不僅在生產面貌上發生了顯著的改變，而且通過這個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熔爐，小生產者的思想也在不斷地受到改造。竹器行業的個體手工業者，原是分散生產、分散經營的，一把劈刀，幾根竹桿，到處都可以做買賣。雖然他們過去大都是一向被人稱為“討飯行業”的，但是也有少數勞動力強、技術較高的，逢上“時來運到”拚上氣力干一陣，也可以賺上一筆錢，如果雇上幾個雇工、學徒，那就更加不同了。幾千年來自私、落后、保守的烙印，也深深地留在這些小手工業者的思想深處，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還不時要從他們的生產活動中表現出來。

就以星鋒竹器生產合作社成立前的第二竹器生產小組來說，他們一共只有54人，組織起來不久就暴露了小生產者的私有觀念和合作社集體所有制公有觀念之間的矛盾。該組的蒸籠部分，利潤好，業務大，社員的收入也高，而另一部分的“細作”（淘米籬、竹籃等），產值低，收入少。1957年“細作”組

一度产品销不出去，每天由組里发给5角錢的伙食費。这时，蒸籠組的社員就成天鬧着要“分家”，說“細作”組沾了他們的光。这个組里有些人斤斤計較个人的利益，甚至参加盘点生財也要“公家”出工資；不少社員公私不分，长期把小組的原料下脚拿回家去不付鈔票。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場开放时，由于手工业者曾經长期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傾向很容易重新抬头。比如当时的两个生产小組的少数小业主和富裕独立劳动者，看到外面“賺头”好，资本主义思想就抬了头，藉口生活困难回家单干，当时公开要求退社的就有5人，还有20余人半明半暗地在外面干。

但是，个体手工业者虽是私有者，同时又是劳动者，他們对于解放以后生产稳定、生活提高的体会是很深刻的。組織合作社以后，个体私有制結束了，生产集体化了，加上不断受到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社員的政治覺悟逐步有了提高。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下，又經過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大社員在政治上、思想上經歷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小私有者的思想面貌終于起了較深刻的变化，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迅速得到成长。

首先是合作社內部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改善，增强了相互間的团結，出現了社会主义互助合作的新关系。如淘籬組在大力恢复手工业小商品生产的战斗中，分担着供应市場的艰巨任务，1959年9月份上級規定的生产指标为1,528只，超过以往最高月产量一倍以上。面对着这个任务，他們不仅在組内发揚团結互助，每天先完工的帮未完工的，劈篾的帮編造的，連过去鬧着要“分家”的蒸籠組的社員也抽人到淘籬組边

学边帮，变成了亲密的战友，由于共同努力，终于超额完成了任务，共做出淘籬 1,758 只，这个数字超过同年上半年的总数，接近 1957 年的全年产量。这一出色的成绩，受到了上级和兄弟厂、社的赞誉。相互协作的社会主义精神还表现在对兄弟单位的友谊支援上。当星锋社的社员们听到第十草品社生产板刷缺少毛竹片时，他们不仅想尽办法支援了竹片 2,500 块，而且还利用休息时间，主动把这些竹片削好后送去。

其次，树立了爱护合作社集体财产的思想 and 自觉的劳动态度。“圆竹”组生产社员万和生，看到蒸笼组每天用下来的小料很多，以低价出售很可惜，他一面积极地向社领导反映，一面动员组内社员尽量利用废料、小料进行生产。在他的倡议下，“圆竹”组向全社提出了包用废、小料的创议，从此，该社基本上做到废、小料不出门，因此，就是在原料紧张的时候，该组也能基本上保持正常生产。在大力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时，他们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供应市场迫切需要，社员们纷纷自动提前上班，放弃中午休息，延迟下班。工人阶级自觉的、忘我的劳动精神，在这些个体手工业出身的社员中正逐步在成长。

再次，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上，明确了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这主要表现在对待工资改革的态度上。原来，星锋社是采用计件制（工场）和拆帐制（修理门市部）两种。这种工资形式在组社初期，对社员从物质利益上来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推动生产发展和提高社员收入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工资直线上升，部分社员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个别社员拿到高工资大吃大喝并影响

生产的现象。如最高的一个月，有人竟拿到 200 多元工资。这样就带来了新的矛盾，那就是社员之间工资相差愈来愈悬殊，不仅表现在年青力壮与老年有技术的社员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在工种之间的矛盾。对拿高工资的社员来说，也增加了顾虑，阻碍了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如蒸笼组青工哇国道是全社工资最高的一个，他苦闷地说：“当时，我怕搞好技术革新会影响我的工资收入，再增加生产又怕人家笑我钞票挂帅。”鉴于这种情况，该社于 1958 年上半年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工资改革，改革的结果是低的有所提高，高的适当调低，使得社内社员与社员之间，社外同行业之间，大致平衡。如蒸笼组平均工资由 84 元调整到 60 元；淘籰组平均工资由 24 元提高到 35 元。部分社员虽然适当降低了工资，但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已经政治挂了帅，加以工资改革后，仍然贯彻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因此，他们也同样进一步发挥了生产上的积极性。上述社员哇国道由于劳动态度好，生产技术好，仍然被评定为全社工资最高的一个。从此，他的心情舒畅，消除了顾虑，在生产上干得更加出色了。在这次大力恢复手工业品的战斗中，他做的大蒸笼，每天从 2 只提高到 3 只，并积极钻研技术，改进了蒸笼底，节约了用料和减少了劳动时间。

保持与发扬生产经营上的特点

小而灵活、便利群众是家用竹器生产经营上的特点。服务方式多种多样，有的自己肩挑叫卖，有的通过零售店和小贩

銷售，有的通過門市直接銷售和兼營修理業務。總之，這種種便利居民的服務方式，深受消費者的歡迎。

但是，該社在建社初期，曾出現過忽視經營特點的缺點。第二竹器生產小組的很多社員，在參加生產小組以後，認為現在是合作組織了，再不能象以前那樣“討飯”似的經營了，因而片面地要求“工廠化”，只願接大批定貨，不樂於自產自銷，而且為了便於管理，還逐步把三個門市部撤併而只剩下一個。由於追求“工廠化”生產，社員只願做活，不管經營，這樣一來，許多產銷關係被人為地割斷，如該組社員瞿漢林有一個老主顧久盛螺絲廠，在他進小組以後就中斷了關係。就在這個時期，正遇到浙江一帶有大量家用竹器品湧到上海，由於這些產品來自原料產地，又是農民兼營的副業，價格低廉，質量較好，比如同樣一只小淘籬，當時寧波來的只買4角，而該組生產的要買4角5分，於是形成了第二竹器生產小組淘籬等家用竹器製品的大量積壓。為了解決這一困難，在黨和上級社的領導和幫助下，適當調整組織形式，將原來三戶生產經營家用竹器製品的手工業戶，在小組領導下恢復其分散生產、自負盈虧的組織形式和經營特點，以便利為居民服務。

在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1958年，該社生產有了成倍的增长。但是由於對家用竹器小商品與人民群众的密切關係認識不足，又一度出現了願做產值高的產品、不願做產值低的產品的現象。該社工業用竹製品的產值比重由原來的20%左右上升到40%以上，家用竹器小商品的產量卻出現了急遽下降的局面，如竹片床從1957年的5,120張下降到1,020張，綉花竹圈由14,600付降到3,000付，毛竹方枱由500張下降到

80張；花色品种也大量地減少，到1959年初，減少的品种占到品种数的三分之一，如毛竹圓椅、飯籬等日用竹器小商品都停止了生产。在修理服务的門市部里，也同样的只接工厂企业的大批修理业务，而不愿接居民零星的修理业务，有的社員还理直气壮地說：“修修淘籬、菜籃，一个人一天只弄到一、两元錢产值，修一天蒸籠修理費就有15元左右，而且干脆利落！”附近居民对此感到很大不便。这些缺点，及时地引起了党委和上級的重視。星鋒竹器生产合作社根据上級的指示，就立即开始采取措施，首先加强一部分为人民迫切需要的小商品的生产，突击生产了元筷97,000双，淘米籬755只，小蒸籠296套，洗帚、甩帚等4,000余件，供应了春节市場的需要。接着，又組織社員学习党中央关于恢复与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指示，对社員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了社員对手工业小商品生产的重要性的認識，使他們树立了为人民生产小商品的光荣感和責任感。其次，在提高認識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社員群众大搞技术革新运动，創制土机器，提高小商品生产的产量。在1959年7—9月份短短的三个月中，依靠了社員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无穷智慧，先后創制了削筷机、劈篾机、拉絲机、打眼机和砂輪机等五台土机器，使这些工序的生产能力提高了2—5倍。如原来生产竹針，需要用手工削、磨二道工序，改用电动砂輪机磨后，一道工序即可，每人日产量从100付提高到300付左右。过去生产一只竹圓筷，把方的竹料削成圓形，就是技术好的社員也要削上16—20刀，削筷机創制成功后，一經滾軸方料竹坯便成了成品，比手工操作要快五倍。这样，从无到有，全社机械化程度达到产值的15%。第三，对于原来停产減产

的品种,按照工种的分工,重新安排专人生产。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在1959年7—9月份内,小商品生产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在品种方面,不但全部恢复了停产的品种,还新增加了毛巾架、水勺、“不求人”(竹制抓背)、“满天星”(洗头用的圆竹梳)、绒线竹针、括浆刀、衣夹、衣架、花竹屏风、消毒篮等10余种从未生产过的产品。在产品产量方面,已经基本上恢复到1958年8月以前的生产水平,如7—9月生产的淘籬有2,912只,相等于1958年全年产量的70%,小蒸籠300套比1958年增加了三倍,而且许多产品的产量都创造了生产上的最新纪录,花竹书架等三种产品的平均日产量,几乎比同行业社、厂高出将近一倍。在为居民修理服务方面,他们也树立了便利为居民服务的思想,恢复了原有的经营特色,增加了修理服务的门市部,修理业务的范围除了过去修蒸籠外,还扩大到修理菜篮、淘籬、竹壳热水瓶等一切竹器用品;营业时间也由8小时延长到10小时半,并取消了平日中午和星期例假对外不营业的制度,仅一个季度,便为附近居民修理了各种日用竹器制品达2,000件左右。由于便利了居民,提高了服务质量,深深受到了群众的欢迎。现在全社社员通过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学习,正在进一步开展以“高产、优质、低耗、多品种”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以生产更多的日用小商品来供应市场的需要。

星鋒竹器生产合作社在恢复与发展手工业小商品生产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无论在产品品种、数量、质量和产值上都有很大的增加和提高,充分发挥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说明了星鋒竹器生产合作社在目前保持集体



2 020 6136 6

所有制对生产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家用竹器制品的生产和修理服务,与人民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需要产品多样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才能适合目前社会的需要。同时,由于从事日用小商品生产,在目前必然是产品零星多变,产值低,利润少,因此还需进一步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为今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准备必要的条件。